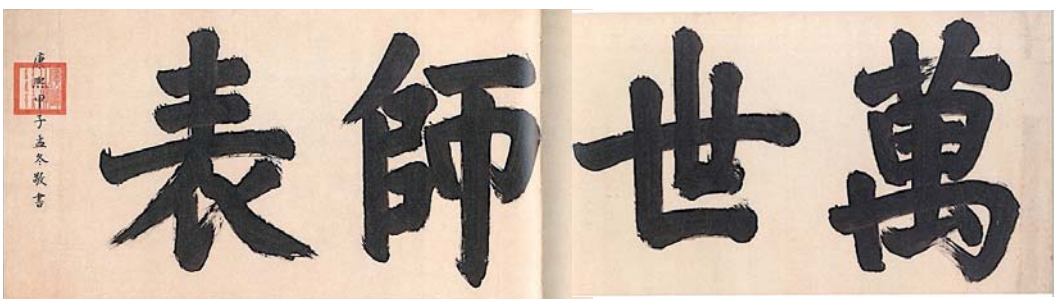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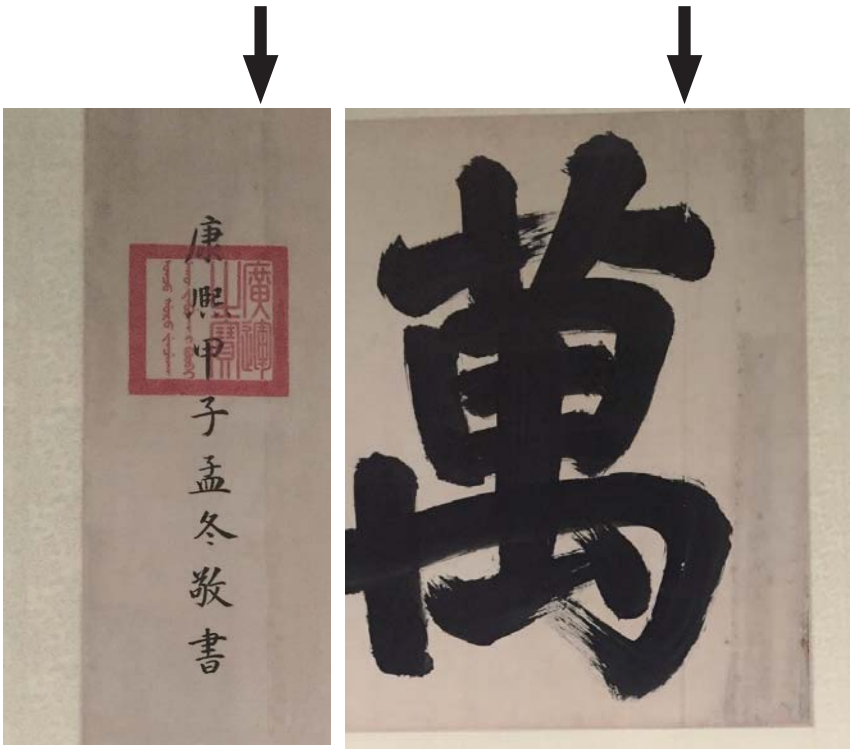


臺南孔廟大成殿康熙「萬世師表」御匾被其它御匾所掩　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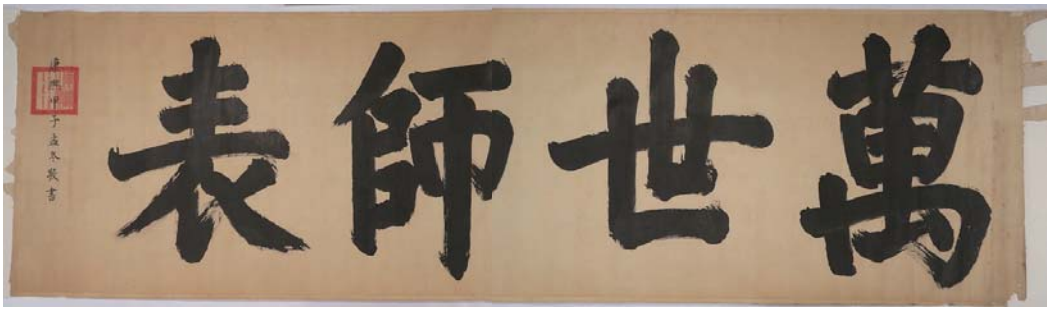


康熙萬世師表御書　《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萬世師表御書兩側接補痕跡　作者自攝



未經故宮重新裝裱之御書　故宮書畫處科長張碧涼科長提供



左



中



右

臺南孔廟廣運之寶御書璽拓本、北京國子監御匾璽、萬世師表御書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I: 10.6541/TJAH.201803_(44).0005

「萬世師表」御書的歷史情境

陳芳妹*

【摘要】本文試圖再探索康熙手書原蹟再現臺灣所提供的文化與政治的新意涵，以補充筆者2013及2017二文未盡之處。包括「御書」文物播遷情境資料的追溯；「御書」本身書寫元素細節始透露的「書風」的建構與來源追溯；「御書」背後「書寫者」的書寫情境及選擇的圖像形式等等的文化政治意涵，特別是作者身為滿族及滿漢皇帝的複雜族群與政治身分的多元糾結、從滿人幼教轉向漢儒學及書法背後所涉及的，政治複雜身分的有意無意間的自主行為的轉化，以及「御書」從「原始使用情境」向「御匾」的「傳播使用情境」的圖像轉化與使用時空情境的變遷。其「原始使用情境」，是伴隨著史無前例的對孔子的儒學的高規格的禮敬儀式，因為原蹟的出現，以及皇帝書寫時間所面臨或掌控的政治情境及文化情境的相互參證，包括「平定臺灣」的「戎」的行為與首度「南巡」伴隨首度「東巡」親幸闕里的「祀」系列行為的關係得以更彰顯。同時，原蹟與各地複製間的關係所涉及的政治性符號化、規格化問題等等現象，也因為原蹟的出現，得以實證論述，並再議原蹟再現，對臺灣臺南孔廟御匾制度的不絕如縷現象所可能提供的新視角，及御書所涉及的康熙的漢化與否議題的論辯。

關鍵詞：御書、御匾、萬世師表、經筵、日講

序：從「御匾」到「御書」再現臺灣

臺南孔廟大成殿，高懸十五座御匾（圖1），是世界孔廟所獨見。它們不只保留了來自大清帝國的八代皇帝的當世御匾原件，更及於民主臺灣的七任總統。它們伴隨著臺灣走過歷史關鍵腳步。就大清帝國八代皇帝部分，它們始自康熙甲子（1684），是臺灣歷史最關鍵的一年。就在不到一年之前，臺灣才從康熙帝口中的：「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臺灣未順，亦不足為治道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兼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缺」；①「臺灣遠在海洋，……自古未登版圖」，② 臺灣卻在此年，第一次始被納入大清帝國版圖成為臺灣府。③ 臺南孔廟第一座康熙萬世師表御匾（圖2）隨之出現。八大大清皇帝御匾在臺南孔廟，則止於光緒帝（1875－1908在位）御匾。因為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大清帝國甲午戰爭失敗，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大清帝國永久割讓臺灣給日本，臺灣正式結束清領階段。臺灣從此告別了清帝國的御匾，更不及於民國初年中國仍延續的御匾制度了。臺南孔廟因此不只不再有如北京國子監保有溥儀御匾，當然，更沒有中華民國初年以來中國北京國子監仍保存的袁世凱、④ 黎元洪⑤ 的「御匾」。⑥

相對的，臺灣則進入日治時期（1895－1945）。五十年間，臺南孔廟歷經了從作為駐軍、官舍、臺南第一公學校或校舍的多元功能轉變，到日本總督府於大正七年（1918）重修臺南孔廟，始恢復大清帝國統治臺灣時的祭孔功能。⑦但縱使祭孔功能再現，從目前臺南孔廟存留的文物論，似未增添任何與日本政權有關的御匾，僅留下記錄重修孔廟時參與捐款的臺日政要名流銅碑（圖3）。可能，日本政權似乎不只未注意到臺南孔廟御匾制度背後所隱含的政治關係傳統，或無意去操作此傳統，更在其重修整理臺南孔廟大清文物中，誤認開啟此

①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2009），第15冊，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日，頁B007313。

②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頁B007606-7。

③（清）傅恆等奉敕撰，《皇清職貢圖》，卷3，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594冊，頁24。

④ 大總統批令，〈政事堂禮制館呈擬訂祀孔典禮〉，《政府公報》（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第830號（民國3年8月27日），頁330；大總統告令，〈本大總統謹率百官舉行祀孔典禮〉，《政府公報》（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第860號（民國3年9月26日），頁291-292；黃克武，〈民國初年孔教問題之爭論（一九一二～一九一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二期（1984），頁214-215。

⑤ 李俊領，〈中國近代國家祭祀的歷史考察〉（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頁77-81。

⑥ 王琳琳，《北京孔廟國子監匾聯考辨》（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頁36-48。

⑦ 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臺南:高畠怡三郎，1918），頁21；黃啟書，〈大正時期臺南孔廟整修之兩位主要人物：枝德二、許廷光〉，《成大中文學報》，第五十期（2015），頁109-1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傳統的第一方「萬世師表」御匾為順治帝的（圖4）。⑧ 這或許因為日本本島從江戶幕府時代以來，雖重儒教，也建有湯島聖堂等祭祀孔子的神聖空間，但大清帝國康熙以來的御匾制度始終未曾進駐，更沒有幕府或天皇御匾進駐的現象。這種日本聖堂缺乏康熙萬世師表御匾的現象，與康熙萬世師表御匾曾經傳播及於琉球⑨ 及越南的現象形成對比。更何況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儒教與日本政治的關係已更為淡化。⑩

不過，臺南孔廟卻也保留了與政治有關但日本官方並未刻意公布的另類文物，即裕仁皇太子在臺南孔廟大成殿前的參祭照片（圖5）。大正十二年（1923），裕仁皇太子訪臺的臺南行程中，雖也安排了在四月二十日參與臺南孔廟祭典，《行啟紀念寫真帖》只有裕仁太子一行人經孔廟門口照片；⑪《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也曾以文字小幅報導。但在有限的隨文出版的皇太子參訪臺南的圖像中，卻只選擇了孔廟旁的北白川宮殿下御遺蹟所。⑫ 所幸臺南孔廟至今仍珍藏了皇太子參祭照片，得以有圖像為證。總之，臺南孔廟在日治時期，不但孔廟基本的祭孔功能曾經被取消，縱使恢復後，大清帝國在臺南孔廟已建立的政治與孔廟的御匾制度關係是被視而不覺的。

惟1949年以後，蔣介石政權從中國播遷來臺，臺灣進入中華民國統治階段。臺南孔廟又再度成為新統治者匾額展示區。蔣中正「有教無類」匾首開中華民國御匾制度的復古端睨。民國39年（1950）8月，蔣中正頒布手書「有教無類」匾（圖6）。其時間，就在蔣中正從中國國民黨總裁於該年3月1日宣布復行視事再任總統⑬ 後，播遷來臺的第一次紀念孔子誕辰，也即是孔子的第

⑧ 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頁186。

⑨（清）張學禮，《清代琉球紀錄集輯》，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92種（臺北：臺灣銀行，1971），頁69；（清）徐葆光，《中山傳信錄》，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306種（臺北：臺灣銀行，1972），頁213。

⑩ 井上素子，〈近代教育錦における儒教的徳目の主題〉，收入守屋正彥，《日本の儒教美術》（筑波：筑波大学大学院日本美術史研究室，2014），頁421-430。

⑪ 臺北市役所發行之《行啟紀念寫真帖》只有裕仁太子一行人經孔廟門口照片。臺北市役所，《行啟記念寫真帖》（臺北：臺北市役所，1923）。

⑫《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二年四月二十日，日刊07版，臺南の文廟祭。

⑬ 三月一日〈蔣總統宣布復行視事〉，蔡忠鉅編纂，《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零）一至三月份》（臺北：國史館，1997），頁4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千五百零一年的誕辰。大清帝國曾在臺南孔廟所建立的御匾制度，因為來到臺灣的中華民國蔣介石政權而復活，不只頒布此匾於新首都臺北的孔廟，⑭ 更及於臺南孔廟，以即時強調其政權與儒家的關係。⑮ 不只嚴厲批評中國自民國五四以來曾產生的批判儒家及孔子祀典風潮；更無視於1934年蔣介石推行新生活運動時，曾遭遇到的對抬出「萬世師表」的孔子，就好比墨索里尼抬出古羅馬的「斧鉞」般⑯ 的冷嘲；更有別於同時在中國的共產政權的批孔。⑰

蔣中正「有教無類」匾，開啟了中華民國在臺灣臺南孔廟的總統贈匾傳統。中華民國在臺灣六十幾年來，經嚴家淦、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歷任總統，到民國105年（2016）11月5日，民主臺灣甫上任不到一年的民選第一位女總統蔡英文，親赴臺南孔廟揭匾第十五座「德侔道昌」⑱（圖7）入列止。顯然，總統贈匾臺南孔廟傳統，在以中華民國為國名的臺灣總統的不同黨派的政權更迭中，仍被共同保存延續在臺灣現代文物史中。臺南孔廟在長達332年間，隨著臺灣最高統治者的更替，逐漸累積十五座清代御匾與總統匾，終蔚為罕見於世界其它孔廟的奇觀。

針對臺灣一級文化古蹟，蘊含著從三百多年前到現在仍繼續的文化與政

⑭〈孔子鄭成功誕辰 總統分別頒匾額 紀念儀式決合併舉行〉，《中央日報》民國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七日〈蔣總統親率文武百官紀念孔子誕辰，于右任院長闡釋「大同篇」真義〉、〈臺灣省會紀念孔子誕辰，吳主席代表蔣總統主祭並舉行教師節紀念大會，頒獎表彰優良教師〉，蔡忠鉅編纂，《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零）七至九月份》（臺北：國史館，1997），頁453-455。

⑮ 周克勤著；林宛瑩譯，〈戰後國民政府與儒家思想：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收入黃俊傑、何寄澎，《臺灣的文化發展：世紀之交的省思》（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98），頁72；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195。

⑯ 朱本源，〈論尊孔與民主矛盾〉，《觀察》，第三卷第十期（1947），頁9；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頁172。

⑰ 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傳》（臺北：聯經，2013），頁139-147。

⑱ 洪瑞琴，〈臺南孔廟再添總統匾額 蔡英文頒「德侔道昌」〉，《自由時報》2016-11-05：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877420，檢索日期：2018.03.07；鄭維真，〈從康熙到小英 臺南孔廟擁15御匾〉，《世界日報》2016-11-05：https://www.worldjournal.com/4515894/article-從康熙到小英-台南孔廟擁15御匾/，檢索日期：2018.03.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關係的大場景，筆者在2013年，曾試圖從臺南孔廟最早的「萬世師表」御匾追溯文物與制度最初產生的文化歷史情境。⑲ 在溯源探索中，對制度最初的形成問題，臺灣方志文獻及四庫全書、起居注等文獻提供相當的線索。但特別是藝術史所關心的，政治性文物的複製的問題等，則只能在與北京國子監保留的御匾比較中淺談則止，僅能就當世仍保留至今的御匾論御匾而已。就御匾本身論，不只因為源生地曲阜孔廟的「萬世師表」御匾在中國文革1966年11月28日已被焚毀⑳（圖8），連各地御匾所根據的最原始根源是康熙手書「萬世師表」御書原蹟，其是否仍存世尚未明確，更遑論目驗詳論了。

所幸，就在2013年御書在臺消息業經披露，原來康熙手書御書原蹟文物原件不只仍存於世，且就珍藏在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㉑ 2017年故宮博物院業已公開展示。㉒ 筆者因故宮之邀及協助，得以率先就近目驗論述。唯篇幅受限，議題與證據等多所簡略。本文試圖再探索康熙手書原蹟再現臺灣所能提供的文化與政治新意涵，以補充筆者2013及2017二文未盡之處。包括「御書」文物播遷情境資料的追溯；經複製再造的「御匾」所無法傳達的，只有原書寫「御書」本身書寫元素細節始透露的「書風」的建構與來源追溯；「御書」背後「書寫者」的書寫情境及選擇的圖像形式等等的文化政治意涵，特別是作者身為滿族及滿漢皇帝的複雜族群與政治身分的多元糾結、從滿人幼教轉向漢儒學及書法背後所涉及的，政治複雜身分的有意無意間的從被動到自主行為的轉化，以及「御書」從「原始使用情境」向「御匾」的「傳播使用情境」的圖像轉化與使用時空情境的變遷。「御書」的「原始使用情境」，是伴隨著史無前例的對孔子的儒學的高規格的禮敬儀式，因為原蹟的出現，以及皇帝書寫時間所面臨或掌控的政治情境及文化情境的相互參證，包括「平定臺灣」的「戎」的行為與首度「南巡」伴隨首度「東巡」親幸闕里的「祀」系列行為的關係得

⑲ 陳芳妹，〈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兼論康熙與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及傳播〉，《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十一卷第一期（2013），頁199-230。

⑳ 楊克林編著，《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香港：天地圖書，1995），頁160-161。

㉑ 張臨生，〈孔德成先生與故宮〉，《故宮文物月刊》，第363期（2013），頁63。

㉒ 陳芳妹，〈萬世師表御書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故宮文物月刊》，第412期（2017），頁29-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更彰顯。同時，原蹟與各地複製間的關係所涉及的政治性符號化、規格化問題等等現象，也因為原蹟的出現，得以實證論述。再者本文將再議原蹟再現，對臺灣臺南孔廟御匾制度的不絕如縷現象所可能提供的新視角。

一、「御書」收藏情境的轉換：從中國曲阜孔府到臺灣故宮

康熙「萬世師表」御書（圖9）原蹟，再現臺灣。它在中國曲阜孔府264年後，再度隨著臺灣與中國近代關係波瀾壯闊的演變中透露更多信息。它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手書後，即保留在曲阜孔廟。它有幸避開了如曲阜孔廟萬世師表御匾於1966年被焚毀的浩劫，在中國文革之前早已離開曲阜來到臺灣。

原來，康熙帝萬世師表御書，是跟隨著孔德成教授，孔子七十七代孫，三十二代衍聖公，㉓ 第一代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㉔ 於民國38年（1949）隨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㉕ 奉祀官孔先生在38年1月以公文（圖10）㉖ 指示奉祀官府秘書李柄南、總務陳壯飛共五人，將25件孔府文物裝箱，押運赴臺。查孔

㉓ 大總統令，〈孔德成襲封為衍聖公此令〉，《政府公報》（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第1503號（民國9年4月21日），頁503。

㉔ 國民政府令，〈「茲以孔子嫡系裔孫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此令」〉，《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臺北：成文出版社，1972），第1643號（民國24年1月18日），頁1。

㉕ 孔德懋，《孔府內宅軼事：孔子後裔的回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150；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傳》，頁134-141；中央社電，〈孔德成將在台從事著作〉，《中央日報》民國38年2月14日，版2；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頁211-212。

㉖ 感謝雪心文教基金會林振惠董事長、吳麗娜老師幫忙提供孔德成文物紀念館保存的相關資料目驗，黃櫻美小姐幫忙拍攝。魏慶友，《稷下雪廬老人》（臺中：雪心文教基金會，2016），頁184-185；《興大檔案中的校園變遷》〈建設篇．校史軼聞〉亦提供相關照片（國立中興大學，《興大檔案中的校園變遷》〔臺中：國立中興大學總務處文書組，20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德成文物紀念館保存有李炳南秘書押運文物的共計四只皮箱（圖11），㉗ 萬世師表御書在何只皮箱，已沒有留下任何相關記錄。但從皮箱的大小及御書的尺寸看，縱使是最大的藤皮木箱，在長度上，御書至少要折成六折，在寬度上，至少要對折。在國共內戰兵荒馬亂中，歷經由曲阜運送到上海的驚險中，㉘ 再到臺灣的。「萬世師表」御書，可能即是公文中所稱的25件之一。

來到臺灣的「萬世師表」御書，曾保存在中興大學前身臺灣農學院提供建物的臺中奉祀官府㉙ 中，未曾公開展示，世人似未注意到此文物所歷經的空間變遷。民國87年（1998），中華民國政府在立法院的批評聲浪中，停止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㉚ 時，孔德成奉祀官決定將康熙手書「萬世師表」御書等移交給臺灣故宮博物院。㉛ 但行事低調，未曾公開對外說明，因此大多數的世人仍未留意到萬世師表御書，不只藏地已在1949年由中國曲阜轉到臺灣，1998年，御書藏家更由臺灣奉祀官府轉到國立故宮博物院。

值得注意的是，御書在未經故宮重新裝裱前，兩邊是呈現不規則痕跡的（圖12）。㉜ 推測1948年御書從曲阜被運送來臺前，可能匆忙間為了移動之

㉗ 尺寸如下：

	藤皮箱	大軟皮箱	小棕色硬皮箱	小咖啡色硬皮箱
長cm	78	74.5	67	66
寬cm	48.6	45.6	36	35.5
高cm	30.8	28.8	19	20

㉘ 吳麗娜等整理，〈訪指導老師談雪廬老人〉，《智燈社創社三十週年社慶特刊》（臺中：中興大學，2002），頁43-44。

㉙ 許淑華，《雪廬居士佛學思想暨行述研究》（臺北：秀威資訊，2006），頁457-458；王雯慧，〈中國儒家文化的傳承——孔德成〉，《中興大學鹿鳴電子報》，第18期（20090826）：http://deer.nchu.edu.tw/2009/08/中國儒家文化的傳承——孔德成/，檢索日期：2017/8/21。

㉚ 洪茗馨，〈奉祀官府將被撤〉，《中國時報》，民國87年9月29日，臺灣萬象版19；內政部民政司簽，〈有關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第80代嫡孫出生年月日暨命名為佑仁，涵請備查乙案，僅簽稿並陳，敬請核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事項案》，檔號095/B050101/0001/001，中華民國內政部藏；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頁208-216。

㉛ 張臨生，〈孔德成先生與故宮〉，頁63。

㉜ 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劉芳如處長及張碧涼科長的幫忙。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便，而從孔府已裱裝好的狀態中被取下，因而改變在原藏地的保存狀態而至此吧？推測當1948年奉祀官決定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下公文李炳南整理搬運部分文物運臺時，可能感受到萬世師表御書的重要性而被選中，倉促中只好改變原收藏狀態而被帶走的。南宋李清照在兵荒馬亂中由北方南遷時，因對收藏文物的必須擇選與對棄置者的不捨，曾留下可貴的心境描述。㉝ 可惜關於萬世師表御書，孔德成奉祀官及李炳南秘書似未留下相關記錄及口述歷史，有關藏地轉移時藏家的選擇及歷史情境似已難以實證了，但御書被重視而擇選在25件文物中，是可以肯定的。就在1949年，御書被擇選離開曲阜孔府作空間的移動由中國來到臺灣。約50年後，1998年，當座落在臺中的奉祀官府被裁撤後，御書再被孔奉祀官選擇與其它事實上是59件孔府書法文物，㉞ 離開孔家，改換藏家，進駐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推測兵荒馬亂中所帶的文物，是以較輕便易攜帶的法書為主，可能有些是歷代皇帝贈與闕里展現皇權與儒家關係的御書。

二、御書的書法情境：從滿文到漢文巨幅翰墨的選擇

無論如何，康熙帝手書「御書」的視覺特徵，確實傳達了「御匾」所難以看到的訊息。特別就視覺本身而言，與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不同，御匾因被高懸在大成殿屋簷下，復因被其它御匾半掩，因此觀者難以近觀文物本身全貌（圖2）。㉟ 臺灣故宮博物院接收的康熙帝手書萬世師表御書（圖9），則保留其未被複製成「御匾」的作者最原始的書寫原貌，觀者得以近觀目驗，傳達出遠觀御匾所未曾透露的訊息。

萬世師表御書的視覺特徵，確實讓觀眾不只面對一件掌握漢文書法技藝的作品，更面對背後特殊身分的作者。他是8歲登基、16歲親政、在日理萬機中，到30歲不只掌握了以漢文書寫巨幅翰墨的漢人書法技巧，更以此禮物成為親幸山東闕里禮讚漢人尊敬的孔子的滿人皇帝。

㉝（宋）趙明誠，《金石錄》〈原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1冊，頁1-2。

㉞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劉芳如處長及張碧涼科長告知。

㉟但1984年的特刊有幸保留有未經其它御匾掩蓋的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全圖。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編，《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三四週年誕辰釋奠暨以成書院一五〇週年特刊》（臺南：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1984），頁13。

臺灣人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康熙帝是滿洲人，事實上他的母語是滿文。確實，康熙帝自幼父母早喪，掌握康熙帝幼教權的蒙古族祖母孝莊太后（1613－1688），㊱極重視其滿文及蒙文而對漢文有所顧忌。孝莊太后認同滿文排斥漢文的態度，在康熙帝12歲時（1666），不只朝鮮李朝顯宗朝廷即有所風聞，所謂「聞其（順治）太后甚厭漢語，或有兒輩習漢俗者，則以為漢俗盛，則胡運衰，輒加禁抑」。㊲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也曾向大臣述及皇五子從孝莊太后所承受的語文幼教：

> 皇五子向在皇太后宮中養育，皇太后愛之，不令其讀漢書，止令其習清書，今漢書雖未曾讀，已能通曉清書矣。㊳

朝鮮李朝對孝莊太后的傳言，與康熙帝的自述皇五子的幼教，是相吻合的。

「好學」且「習國故」的宗室昭槤㊴（1726－1883），更留下孝莊太后對康熙幼教的具體的師生資料：

> 蘇麻喇姑，孝莊文皇后之侍女也。……仁皇帝幼時，賴其訓迪，手教「國書」，故宮中甚為高品。㊵

㊱（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二集，卷40，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8冊，頁1。（清）乾隆十二年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卷108，頁39。

㊲（清）愛新覺羅胤禛（清世宗），《聖祖仁皇帝聖訓》，卷1，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1冊，頁23；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顯宗改修實錄〉，卷16，頁8，顯宗七年（1666）九月丁酉條，《朝鮮王朝實錄》（首爾特別市：東國文化社，檀紀4290〔1957〕），頁525。

㊳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22冊，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十日，頁B011021。

㊴趙爾巽，《清史稿．列傳二》（臺北：鼎文，1981），卷216，頁8980。

㊵（清）昭槤，《嘯亭續錄》，卷4，頁476，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36編，第6冊（臺北：新興，1984）。楊珍，〈蘇麻喇姑研究〉，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古史文存》明清卷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4），頁796。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她雖為侍女，不只因性巧黠，「國初衣冠飾樣，皆其手製」。康熙壬午（1702）逝世時，並「葬以嬪禮，以示寵也」。

蘇麻喇姑為康熙帝必然紮下很好的滿文基礎，康熙帝的幼教，應是以滿文為母語的。繼而才有向漢語、漢文、漢經典、漢書法的第二語文的解讀與書法藝術能力的轉化過程。

比康熙帝只大兩歲、在康熙帝宮廷五年（1688－1693）的法國耶穌會神父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在1697年為法王路易十四寫秘密報告時，不只強調康熙帝的滿洲來源，更注意到44歲的康熙帝「比朝廷中任何大臣都能更好的講這兩種（滿文與漢文）語言」。㊶ 白晉對康熙帝的語言能力的觀察，是否是溢美之詞？目前我們雖已無法對當時朝中大臣的滿漢語文能力進行評估，但白晉所看到的44歲的康熙帝已「寫得一手漂亮的『滿文』和『漢文』看來，我們正可就「萬世師表」巨幅翰墨的出土，評估康熙帝在30歲時，到底具備的何樣的漢文書法技藝？此御書正為有限的流傳於世的康熙帝早期巨幅楷書書法作品，㊷ 提供新的重要的理解資料。

（一）「御書」的視覺特徵

1.「巨幅」的有意選擇

在細究其書法作風前，觀者已先被其巨幅所震撼。確實，萬世師表的「巨幅」，是傳世康熙帝書法作品所罕見的，㊸ 而其「巨幅」，更是有意選擇的結果。原來405公分長，120.8公分寬的萬世師表御書本身，並非如御匾所示，全

㊶（法）白晉著；馬緒祥譯，〈康熙帝傳〉，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197、219。

㊷ 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5期，頁90-104。

㊸ 根據楊丹霞所收錄的傳世的康熙帝早期作品，尺寸皆不及萬世師表御書。楊丹霞前引文頁94-96。萬世師表御書的尺寸也比北京國子監現存康熙帝頒布河南等地御書石刻大。陳宇彤，〈北京國子監康熙榜書卧碑考〉，《北京文博》，2010年4期，頁45-49。

臺灣大學藝術學院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寫在同一張紙上，而是左右各接補約20公分（圖13）。不只左邊接補處，正是「廣運之寶」印章壓印處。印章從接補處壓印，正橫跨兩紙面，猶如騎縫印的功能般。右邊「萬」字，部分筆畫也落在二段紙張的接補部分。顯示此增寬，不是後人所為，而可能是書寫者書寫前已決定的巨大篇幅的尺寸。此決定，可能已在當時造紙的最寬極限之外，因此是有意增寬的，騎縫印及「萬」字的橫跨二紙更協助說明其增寬的有意性。推測康熙帝書寫前，可能已預定這次為孔子所書寫的，是要比五年前為敬愛的祖母祝壽的「萬壽無疆」匾（圖14）㊹ 的尺寸（包括框架386/144cm）還寬大。二幅雖同為四個字，但由於萬世師表較寬大，每個字定然隨之比萬壽無疆幅更大。「萬世師表」御書或許是康熙帝眾多御匾中之最吧？康熙帝御書「功存河洛」（圖15）、「昌明仁義」（圖16）、「嵩高峻極」（圖17）、「靈濆安瀾」（圖18）四石刻，㊺ 現存中國北京國子監，「功存河洛」碑體尺寸為高115.5公分、寬289.7公分，寬度比萬世師表御書短約一百公分。㊻

康熙帝是否以其巨大表達對孔子的推崇，及其親訪曲阜孔廟伴手禮的重視，可惜起居注並未留下證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大，不只是使得觀眾自然要遠觀，始能觀看整體。衍聖公孔毓圻曾為康熙送禮時記錄康熙帝在出示御筆禮物時，最終形式及地點的設計，「懸匾殿中」正是。這種為懸在曲阜孔廟大成殿的萬世師表，比萬壽無疆匾大，是否也因為懸掛地點的公領域與私領域之不同？「萬壽無疆」匾是懸掛在太皇太后宮；㊼「萬世師表」匾則是康熙帝向孔家親自提出要懸掛在曲阜孔廟大成殿的。這種以皇帝書法的政治符號進駐孔廟大成殿，在中國史上及中國孔廟史上是史無前例的，相信已博讀儒家經典又常被儒學講官群圍繞的康熙帝不可能不知。他是否也要以其有意的求其大來完成其作品的史無前例的陳列地位？

㊹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6冊，康熙十八年二月十日，頁B002872-6。故宮博物院編，《普天同慶：清代萬壽盛典》（北京：故宮，2015），圖版1。

㊺ （清）汪灝，〈宸翰賦〉，《皇清文穎》，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0冊，卷46，頁13。

㊻ 陳宇彤，〈北京國子監康熙榜書臥碑考〉，頁45-49。感謝繩博攝影、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訊息。

㊼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6冊，康熙十八年二月十日，頁B00287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康熙帝向孔府展現的書法風格特徵㊽

「萬世師表」，四個大字，實際書蹟，每字縱橫約80公分左右。由右到左，一體完成。這四字，行間布白，在書幅上寫得相當「滿」。包括字體結構、起筆、落筆、筆畫間的先後堆疊、運腕之法、轉筆處、墨色的乾濕與濃度的變化等等。就「筆毫含墨，運筆時墨落紙張的表現」論，這四字，墨氣相當濃重，且無墨瀋灑溢落字外。雖然每一筆以其粗細變化不大，似追求楷書的中和平穩，不求新奇，端莊穩重。但細究此巨幅單一筆觸，因粗大且長，往往呈現墨分五彩的濃淡變化（圖21）。有不少起筆處，墨多濃郁潤澤，收筆處，則已乾擦飛白（圖22），㊾ 起筆、收筆處的毛岔較多，大抵是因為筆毫較軟的緣故。但力道勻稱，收筆竣快果決，㊿ 因此中和平穩中又顯得濃郁粗大（圖13）。(51) 如此四字，由右到左，依序為74、86、73、87公分的大字，(52) 再度顯示，此巨作在下筆前可能經過一定的構圖佈局吧？

或根據康熙朝起居注初步評估康熙帝頒賜御書就多達800餘幅，(53) 康熙帝可以隨時寫字賜與諸臣，或者出巡到處題字，江蘇常熟虞山劍門風景區有石刻

㊽ 感謝學者王耀庭、吳誦芬、羅啟倫、李政提供書法風格方面的高見。

㊾ 王耀庭、李政皆以為是用墨寫大字的自然結果。大字需筆中富墨，康熙帝是蘸墨一次，寫一個大字，所以在中側鋒互用時，以及到最後幾筆，筆中墨已少，飛白自然顯現。

㊿ 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臺北：故宮，2017)，頁31。

(51) 請參考臺大藝術史書法史碩士畢業生羅啟倫對康熙帝萬世師表書法有以下批判性的看法「此作氣勢渾厚，寫的也用心，在康熙早年書法中已屬佳品。不過〈萬世師表〉的用筆有些呆板之處，結字也有些不妥當。都看得出來此時康熙功力、火候，都尚淺一些。結字部分，如『世』字中豎頂天，『表』字上方空間沒拿捏好以致下方空間逼仄筆畫無所施展。用筆上，每個字的橫、豎粗細都沒有變化的呼應關係，使得全字滿溢難以收束，如『萬』字因筆畫複雜更顯如此。此外起筆、走筆沒有太多細節，線條顯得單一乏味，大抵都可以看出年輕書寫者的跡象」。

(52) 感謝吳誦芬細心丈量萬世師表四字尺寸。

(53) 康熙帝頒賜御書就多達800餘幅。其中，大字、匾額、大軸280餘幅，字、字幅220餘幅，御詩單條、軸110餘幅，御詩扇、扇80餘柄，對聯70餘副，唐宋詩單條、卷20餘幅，手卷、長卷10餘幅。張萬興，〈從起居注看康熙帝頒賜御書的政治功用〉，《歷史檔案》，2012年2期，頁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煙嵐高曠」（圖19），㊹是為例，它們的原稿，或可揮筆立就。但就「萬世師表」御書如此大字，可能難以當場立就吧？是站立或懸臂寫字此巨幅？可能需一支多大的筆？何樣的筆？多大的桌子？故宮書畫處曾根據一張現存康熙年輕握毛筆準備揮毫的畫作（圖20），針對此筆進行複製，該同事與王耀庭前處長不約而同推測，萬世師表御書可能需要如康熙帝畫中手握的大筆吧？㊺此巨作或也可推測，康熙帝書寫時，或許很難像畫作中坐著，而需站著，以懸腕，可能須在比畫中更大的桌子前，才足以佈局揮灑使出足夠的力道吧？

這位滿人皇帝在五年前，25歲時，也揮毫，以「萬壽無疆」四大字（圖14），並親自視匾懸掛在慈寧宮，為其敬愛的祖母孝莊皇太后祝壽。目前康熙帝書法原蹟是否仍存？雖不可知，但以現存世的緞面繡織成的匾額看，粗細一致的楷書，收筆往往乾帶飛白，顯示共通的風格與習慣。

若「萬世師表」的書風有所師法的話，其結體寬短、筆畫粗細一致，比較豐潤多肉，顯露近於顏體。如「表」（圖21）及「萬」（圖22）字，筆畫間的構形與佈局，尤其「表」字捺筆，近顏真卿〈多寶塔碑〉（圖23）。同時萬世師表巨大的字，每一筆又往往墨分五彩墨由濕黑到漸乾到乾擦飛白，因此，雖筆筆粗細相近，似少變化，但透過乾濕濃淡的巨大筆觸，亦顯張力，而有沈鬱粗重之感。康熙帝跋顏真卿墨蹟，稱宋祈雖以為顏真卿筆力「遒婉」，帝披閱遺蹟，卻覺其「凝重沉鬱」。㊻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八日，康熙帝與沈荃在乾

㊹「烟嵐高曠」，楷體，刻有邊框，邊框內刻雙龍圖形， 及「康熙御覽之寶」印，高59、寬140公分。碑上有「御筆題賜翰林臣沈宗敬……康熙戊子小春，得此一峯……以垂不朽」為沈宗敬（1669-1735）獻畫所得。劍門者或許是御書的石刻本？張軍，《常熟磨崖石刻》（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7），頁18-19。常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標校，《重修常昭合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頁938。康熙御題石刻，查沈宗敬為沈荃之子，有康熙帝很感念其父之載。清聖祖御製；（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諭大學士馬齊等〉，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四集，卷18，頁9。康熙帝書法曾師法沈荃，見下文頁190。感謝李政提供訊息、圖版，以及張軍的攝影。

㊺感謝羅啟倫推測「「萬世師表」御書的起筆、收筆處的毛岔較多，大抵是因為筆毫較軟的緣故。所以綜合來看，康熙用的工具，大抵是清宮的提筆、甚至抓筆一類的大筆」。

㊻（清）孫岳頒等奉敕撰，〈跋顏真卿墨蹟後〉，《佩文齋書畫譜》，卷67，頁7，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2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宮共賞宮中所藏唐宋元明名家翰墨，對顏真卿書，同意唐明皇從人品忠臣論顏真卿書法特徵，所謂「此魯公書，嚴氣正性，可卜後來臨難風節」的態度。[57]「萬世師表」豈是康熙帝試圖表達其所體會的「顏」風「凝重沉鬱、嚴氣正性」內涵？但又自然流露其年輕的明朗的廟堂正性大器。學者論述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以為康熙帝臨過顏真卿，但存世者多屬晚年對聯、橫額及書畫題跋[58]之作，而以「未有可以確認為早年的此類（楷書）作品傳世」為憾。[59]看來萬世師表御書的出土，正是康熙帝早期帶有顏風的重要代表作。

但必須注意的是，「世」字，又略帶歐風。歐陽詢皇甫誕碑「世」（圖24）刻意拉長最右邊豎筆，以營高峻之勢。康熙帝則拉長中間，在高峻中又求平衡。康熙帝曾以「外露筋骨」說明歐風之有別於虞世南書風的「內含剛柔」。[60]「世」字雖略帶歐陽詢拉長的筆意的習慣，但似乎並不刻意表達出他所體會的「外露筋骨」的歐風內涵。

左邊盡頭，有一行落款小字，「康熙甲子孟冬敬書」（圖25）。結體端莊冲和，惟骨力仍有所侷促，與康熙二十七年「暢春園記」[61]書風神似。「子」、「書」與虞世南「孔子廟堂碑」[62]（圖26）近，流露康熙帝對虞世南「內含剛柔」風韻的體察。

總之，萬世師表御書可能即是康熙帝早年學習晉唐傳統而尚未定型於董風之作。

---

[57]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3冊，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八日，頁B006022。

[58] 題蔣廷錫「人參花」、「花鳥寫生」軸等。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書畫圖錄》，第十一冊（臺北：故宮，1993），頁79、83。

[59] 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頁94。

[60]（清）孫岳頒等奉敕撰，〈跋虞世南墨蹟後〉，《佩文齋書畫譜》，卷67，頁7。

[61] 楊丹霞以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暢春園記楷書近歐陽詢風格。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頁95。

[62]（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廟堂碑唐本，原色法帖選12）（東京：二玄社，1985），頁1。羅啟倫、李政有相近的看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落款小字中，「康」字下半部、以及「熙」「甲」二字之上，鈐印「廣運之寶」滿漢文並列璽印。漢語詞彙部分，雖沿用自明御璽，[63] 但滿漢文並陳一璽（圖27），不僅是康熙帝「以謹封識」的御璽，更說明書寫者對滿人身分的強調。這種以滿漢御璽蓋在孔廟御書上，在大清帝國孔廟御書制度形成中，是唯一而特殊的，因此在其意象傳播於大清帝國孔廟網絡中，形成仿本的地方特色詳後文。

滿文的羅馬拼音及譯注為：左邊第一行為三字，onco（寬廣的）goro（遠）jecen（疆界）；左邊第二行為四字，aku（無）yabun（行，行為，行走）I（的）boobai（寶貝），約可粗疏的直譯為「寬遠無疆之行之寶」。

關於滿文部份，更代表著康熙時期對「廣運之寶」的意譯方法及清文的楷寫方式。這方璽印與乾隆二十五寶「廣運之寶」（圖28）的滿漢翻譯詞彙的方法及強調以滿篆與漢篆並陳不同，卻保留了乾隆十三年（1748）滿篆改革前、因改革而幾乎消失的具體的視覺演變軌跡。[64]

無論是康熙帝對皇子、大臣的「自述」，或「他述」。後者包括曾在宮中法國傳教士白晉致信法王路易十四的描述，[65] 以及起居注官或南書房注記對康熙帝的記錄等等資料，皆顯示皇帝喜好及勤練書法並好以書法賞賜。雖然身為甫20歲的皇帝曾因喜愛書法游情翰墨而花時間練字遭到近臣提醒，[66] 他確實一如一般的善書愛書者，是紮實的經過勤練漢人書法、臨名帖、觀摩宮中名作、並有他心儀的書法大師圍繞的。[67]

在完成「萬世師表」的30歲之前，特別在南書房成立的康熙十六年前後，以及南書房記注已發表的康熙十六年到十九年期間，不只提供較豐富的記錄，

---

[63] 「廣運之寶」印章乃明代十七寶璽之一，作獎勵臣工用（〔清〕張廷玉等，《明史》，卷68，頁1；卷74，頁11）清廷沿用，存交泰殿二十五方御寶之一，則作「以廣封識」用（〔清〕允祹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卷2，頁8）。

[64] 有關此方璽印的討論，請參考陳芳妹，〈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兼論康熙與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及傳播〉，頁215-216。

[65] （法）白晉著；馬緒祥譯，〈康熙帝傳〉，頁197、219。

[66]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2冊，康熙十二年三月四日，頁B000604-5。

[67] 陳捷先，〈康熙皇帝與書法〉，《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七卷第一期（1997），頁1-18；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頁90-104。

臺灣大學圖書期刊資料庫

加上南書房的成立，似乎說明此期間年輕的日理萬機的皇帝，因喜好而自然流露的對書法及藝文的投入，互動。

學書法的辛苦歷程、價值及對引他進入書法世界的沈荃及張林二內侍，康熙帝充滿感激，皆成為他期許幼時兒子雍正帝的「庭訓」，而與學經並陳。[68]「朕少年好學如此，更耽好筆墨」。「少年」確指何時？自8歲起即當皇帝的康熙帝，自康熙十年九月起「沈荃曾教我書法」，確實，少年學書法時，他已令沈荃進呈草書千字文、百家姓以備自己臨摹；[69] 他召沈荃至懋勤殿出示御府晉唐宋元名蹟及淳化蘭亭[70] 諸帖包括九成宮帖。[71] 他欣喜接受國子監祭酒馮源濟進獻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自謂「常臨王羲之字」。[72] 他親跋王羲之曹娥碑真蹟；[73] 他與張英在懋勤殿觀賞內府珍藏王羲之、懷素、顏真卿、蘇軾、朱熹、趙孟頫、董其昌等名蹟及宋初搨淳化閣帖全部。[74]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康熙帝書寫完金書「御製元旦進衣太皇太后前表文」時命高士奇侍觀，雖然高士奇不免奉承皇上楷書「深得〈樂毅論〉兼〈黃庭經〉筆法」，[75] 書法皇帝卻道出學書臨摹傳統，自見不足的艱辛而真切的體會：

---

[68]（清）愛新覺羅胤禛（清世宗），《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7冊，頁1-2。

[69]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5冊，康熙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頁B002204。

[70]（清）孫岳頒等奉敕撰，《佩文齋書畫譜》，卷67，頁5。

[71]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5冊，康熙十六年六月十七日，頁B002237。

[72]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5冊，康熙十六年八月十八日，頁B002301。（清）孫岳頒等奉敕撰，《佩文齋書畫譜》，卷67，頁5。

[73]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5冊，康熙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頁B002414。（清）孫岳頒等奉敕撰，《佩文齋書畫譜》，卷67，頁4；該跋後經羅振玉收藏，今入藏旅順博物館。韓行方，〈旅順博物館藏康熙帝臨帖與手書墨跡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1期，頁80-85+42。

[74]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王澈，〈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2001年1期，頁24。

[75] 其實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午時康熙帝才在懋勤殿臨摹王羲之樂毅論小楷。王澈，〈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南書房記注》〉，頁26。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朕向來作書，若一字結構未妥，必連書數十字，然後取古人法帖證之。⑯

這種臨摹之功與心境在幾天前也流露「朕朝夕臨摹，常恐未合古法耳」。⑰他從臨摹到仿名作如蘇軾〈月夜泛舟〉、趙孟頫〈秋興賦〉。⑱在訪曲阜孔廟的30歲以前的學習書法過程中，他確實已游情於漢人重要的名家書法傳統。

24歲的滿人康熙皇帝，在其青春時光，成立與漢人隨時可論書藝與經意的「南書房」。論者不免看出是滿人統治者籠絡漢人的手段之一。⑲但可以確定的是，康熙帝游藝於漢人書法，並把書法作為訓練皇子及庭訓的重要內容，且善用此技藝，不只由上及下，賜給臣下、官署、寺廟、書院等等。⑳他在25歲時，更以此書藝，為最敬愛的祖母，也是對滿族文化認同有所擔憂的祖母祝壽。他在30歲時，更手揮巨幅翰墨，選擇以最大的版面，作為親幸闕里、禮讚孔子的禮物。他在漢人尊敬的孔子誕生地闕里聖堂—大成殿中，在孔子塑像前，向他的子民展現如此的形象。

三、「御書」的文化與政治情境：「萬世師表」與「武力征服臺灣」

（一）御書的文化與學經基礎

決定親訪孔子故鄉的30歲的年輕滿人皇帝，是真心以「萬世師表」歌頌孔子嗎？或只是虛應故事的政治秀？除了書法技藝已相當掌握外，當時他對儒學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

⑯ 王澈，〈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南書房記注》〉，頁26。

⑰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王澈，〈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南書房記注》〉，頁24。

⑱ 康熙十七年四月十八日。王澈，〈康熙十七年《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1995年3期，頁8。

⑲ 朱金甫，〈論康熙時期的南書房〉，《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年2期，頁27-38。

⑳ 莊吉發，〈繙譯四書—四書滿文譯本與清代考證學的發展〉，《故宮文物月刊》，第412期（2017），頁18-27。陳捷先，〈康熙皇帝與書法〉，頁1-18。

臺灣大學圖書期刊資料庫

確實，孝莊皇太后所擔心的強勢漢文化，已在滿人幼帝生活中滋長，終勢不可遏。康熙帝不只在25歲時，自己以漢人的書法形式的御匾為皇太后祝壽，康熙帝對兒子回憶8歲登基時，談及事實上已開始有張林二內侍以經書教其句讀。[81] 就在康熙帝30歲赴曲阜拜孔子的兩週前，即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四日在南巡路上駐蹕燕子磯，夜讀至三鼓，高士奇勸其節養勿過勞，引發他深夜與臣暢談[82] 一路20幾年來自主性的學儒、樂儒的方法、進程、在互動中的體會，以及樂此不疲的目的所在：[83]

> 朕自五齡即知讀書，八齡踐詐，輒以《學》《庸》訓詁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後愉快，日有所讀者，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及《四子之書》既已貫通，乃讀《 書》，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見之施行。及讀《大》、《易》，聖人扶陽抑陰、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覆探索，必心與理會，不使鮮毫扞格，實覺義理悅心，故樂此不疲。

30歲的康熙帝。決定到孔子故鄉親祭前，真的如君臣所夜談的，已讀過《四書》、《尚書》、及《易經》嗎？

每天兩位起居注官，從康熙十年到二十三年見孔子前的起居注的十三年中，我們看到這些經書，包括他所讀何篇？何章？何日？何時？不折不扣，在日理萬機中，逐日經歷，歷歷在目。基本上從康熙十一－十六年間已讀完《四書》；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讀完《尚書》；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見孔子時仍在讀《易經》的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皇帝親訪曲阜孔廟的前一天，突然要求孔府增加如經筵日講的講經節目，並指名講《大學》第一章與《易經》第一章，顯然皇帝都已念過，在讀經方面，他是有備親訪的。

---

[81]（清）愛新覺羅胤禛（清世宗），《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2-3。

[82] 這段康熙與高士奇的學儒夜談，不只起居注做了當日的記錄，康熙帝可能也相當重視，因此在其〈南巡筆記〉、〈行殿讀書賦并序〉（〔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20，頁3；卷30，頁18）中一再提及。

[83]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17冊，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四日，頁B00843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們不可能認為，《起居注》所記錄的康熙日講，只是篇章的流水帳或虛應故事而已。因為在十二年間的起居注中，我們看到在讀經歷程中，康熙帝由18歲的青年，到30歲的壯年，是經歷了由被動的讀與背誦到不時的思考、主動提出討論的問題與內容。

他從滿族的幼教中進入儒學領域且樂此不疲。在旁邊的漢儒臣如熊賜履（1635－1709）等，急切地欲將滿人幼帝導入中國漢人皇帝教養已有的傳統—經筵與日講制度中，而上奏宜召開外，[84] 這位17歲的年輕帝王已在被提醒中，自主性的意識到探索儒學，對成為統治大清帝國的漢人大眾的好帝王，不只重要，是必要且急迫的。他終於決定在日理萬機中，視研讀儒學為大典。康熙九年十月十三日，他諭禮部，「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即舉行」。[85] 其距翰林學士熊賜履在瀛台試講論語「道千乘之國」的七月，[86] 不到三個月。康熙十年，經筵日講制及講官群的任命與講課皆正式開始。值得注意的是，此三件行為的初次執行，康熙帝皆遣官祭告孔子，[87] 充分說明經筵日講制的執行與內容，是與尊孔息息相關，並把康熙帝從滿族語文的母語文化幼教中，轉到孔子儒學中。

從康熙十年到二十三年赴曲阜孔廟前，康熙帝在經筵日講制度下，是經歷從被動到研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到《尚書》、《易經》的過程。他自稱「朕聽政之暇，即於宮中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疲」。這位日理萬機的年輕帝王所言，是真話嗎？或只是門面話？

---

[84] 張英，〈講筵應制集序〉，《皇清文穎》，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0冊，卷14，頁20-21。陳東，〈清代經筵制度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6），頁16。

[85] （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2，頁10。

[86]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1，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0冊，頁3。（清）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卷35，頁7、9。

[87] 康熙十年十月二日丙戌下令熊賜履等計十四人的經筵講官群形成，十月二日戊戌經筵禮初次舉行，十月四日庚寅初次日講（（清）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35，頁7、9、11）。劉家駒提醒經筵日講與孔子的關係，（劉家駒，《儒家思想與康熙大帝》〔臺北：臺灣學生，2002〕，頁38）有啟發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們不妨從講學進行中，皇帝所主動提出的兩方面細節的改善，作初步檢證。一就講學的時間與頻率方面，康熙十二年，康熙帝主動提出，增加次數。改日講的「隔日進講」成每日「日侍講讀」，[88] 改「寒暑綴講」成「寒暑不必綴講」。[89] 康熙帝讀經，主動停止寒暑假。

二就講學方式方面，康熙帝從被動的聽講，到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提出增加「朕覆講」，理由是「如此互相講論，方可有裨實學」；[90] 隔日即實行。當張英講「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時，康熙帝提出「仁霸之辨」與「孔子何以稱管仲如其仁？」等問題討論。[91] 到康熙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康熙帝更主動提出「朕先親講」。[92] 顯然這位滿州皇帝雖不像常圍繞在身邊的常參與決策的日講大臣，通過科考的精英儒官，個個已飽讀儒家經典，[93] 但康熙十六年南書房成立之際，六年下來，他自信已相當掌握了漢人的儒學經典，除《起居注》已常見的君臣討論之外，《南書房注記》，更不乏君臣間有關經義及決策間更深入的討論。

在此讀經的十三年間，他責成經筵及日講官陸續將日講內容出版成三本：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出版《御製日講四書解義》親製序文，[94]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刊行[95]（圖29）

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出版《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圖30）

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御製日講易經解義》（圖31）

---

[88]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2冊，康熙十二年二月七日，頁B000563。

[89]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2冊，康熙十二年三月四日，頁B000604。

[90]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3冊，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頁B001436。

[91]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3冊，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頁B001438-9。

[92]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5冊，康熙十六年四月十四日，頁B002156。

[93] 有關經筵日講官的資格及選拔，請參陳東，〈清代經筵制度研究〉，頁34-36。

[94]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5冊，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八日，頁B002426-7。

[95]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5冊，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頁B0024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本漢文解義，正成為康熙帝親幸闕里給衍聖公孔毓圻、五經博士孔毓埏、顏懋衡等、以及曲阜縣知縣孔興認的禮物。[96]

另一方面，三種滿文、蒙文翻譯本，也與漢文本同時出刊，[97] 頒行八旗及各省學宮，成為八旗官學與書院教育的重要內容。[98] 雖然康熙帝對滿文、滿俗，事實上跟其祖母一樣，不免自然流露其母語母文化即將瀕臨衰退的危機意識。[99] 但在研讀漢強勢文化的過程中，他所行為的，卻是主導走入何炳棣觀察到的清帝國的「漢化現象」，[100] 安布建夫筆下的清帝國從第一期的「偶然的」到第二期的「積極的華化期」。[101]

康熙帝在君臣夜談中，對其學經，不只一次以「樂此不疲」自況。也與雍正帝整理康熙帝對其勸學，談及年少苦讀經書，至痰中帶血的肺腑敘述相吻合：

---

[96]（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10，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2冊，頁15。

[97]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板橋：稻鄉，2002），頁68；莊吉發，〈繙譯四書—四書滿文譯本與清代考證學的發展〉，頁18-27。

[98]（清）托津等，《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六十四輯》（臺北：文海，1992），卷310，頁3676-3697；黃麗生，〈治統下的道統：清代八旗官學書院及其學禮學規〉，收入高明士編，《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231；白．特木爾巴根，〈清代蒙譯儒學典籍及其流傳〉，收入黃麗生編，《邊緣儒學與非漢儒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122-123。

[99] 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康熙帝有「恐後生子弟漸習漢語，竟忘滿語亦未可知」的憂慮，因此責成翰林院學士傅達仁著手編輯滿漢翻譯字典。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2冊，頁B000657-9；康熙四十七年《御製滿文清文鑑》發刊，康熙帝序文，透露出更深層的憂慮「近來老成耆舊漸就凋謝，因而微文奧旨久而弗彰」。（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174，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4冊，頁1。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康熙帝在百忙中仍覽畢所修《太祖實錄》改訂滿漢翻譯不當處。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7冊，頁B008285。

[100] 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1967), pp. 189-195.

[101] 安部健夫，《清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1），頁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及至十七八，更篤於學，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誦讀。日暮理事稍暇，復講論琢磨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102]

到底康熙帝在儒經中讀到什麼？何「萬幾餘暇」，仍「夙夜兢兢」？他在研讀經典後，何以在30歲終究決定要親自到曲阜向孔子致敬？康熙帝25歲，日講四書完成後，為出版第一本日講《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圖32）所作「序」中，為我們提供部分重要的理解線索。

康熙帝坦承，身為皇帝「留心問學」，是為了「孳孳求治」，尋求統治之道。他在研讀《四書》中，體察到，「道統」在《四書》，「治統」也在《四書》。他找到「治統」與「道統」之間，也就是「政治」、與「知識」的結合點。他正因此了解到孔子正以其「生民未有之聖」，「作君」「作師」，建立了培養統治者的知識，他與列國國君、士大夫、及門弟子所論的，正是「政」與「學」。因此，堯、舜、禹、湯、文、武的「治統」，正因孔子《論語》、曾子《大學》、子思《中庸》、孟子《孟子》等四書，使「道統」流傳萬世，「治統」賴之維繫。所謂「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他宣稱出版該書，是期望他的臣民與他一起探索四書聖人大義，而期望將其治統推進於「三代文明之盛」。[103]

這位年輕的滿州帝，正宣示以孔子為師。他從儒家尋求治道，思考如何以其「治統」結合「道統」於一身。[104] 他不止於被動地聽講經典，他在研讀中，化被動到積極、主動、迫不及待。在此期間，他雖仍不時有機會接觸宮中傳教士帶來的西學，他也深感興趣，他甚至是第一位把西方音樂音符符號、觀測儀、地圖實測法、解剖學等引進的皇帝。[105] 但事實上，他在宮中有更多的研讀

---

[102]（清）愛新覺羅胤禛（清世宗），《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3。

[103]（清）庫勒納等撰，《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收入《四庫全書珍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第41冊；（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23，頁4。

[104] 黃進興以政治化的道統觀論之。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 1（1987），頁105-131。

[105]（法）白晉著；馬緒祥譯，〈康熙帝傳〉，頁220-233。馮明珠主編，《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臺北：故宮，2011），頁114、121、126、144-153。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儒學通過科考的儒官的隨侍群決策群，在面對著大半的漢人子民中，他在儒官的建議中，在不由自主中，也在自主的研讀儒家的道統中，尋找到，也建構出他的統治大清帝國之道。他似已深知儒學對統治大半漢人的知識的力量，他在「治統」思維中，實驗著如何與「道統」相互為用，以壯大其「治統」。何炳棣及黃培（Pei Huang）皆認為康熙帝強調儒家思想為其治國所必須；[106] 白晉認為康熙帝研究儒家經籍是為了使自己適合他所統治國家的特點，[107] 有其道理。

（二）御書、幸闕里與「掃盪臺灣」論述

但本文更要提醒特別觀察的是，這位30歲的滿洲帝，在研讀過《四書》、《尚書》、正讀《易經》中，他的《起居注》告訴我們的是，他是同時在面對「治統」中的問題，並同時在擬定各種大清帝國的重要決策的。

諸如從康熙二十二到二十三年間，他從「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108] 到自我承認長於陸戰，「海上風滔不測，涉險可虞，是以朕不強之使進」，到觀施琅之奏「挫其鋒銳，火焚砲擊，沉其戰船，竟克彭湖，實為可嘉，施琅之功甚大」，決定重用施琅武力進剿臺灣、[109] 到「原欲滅絕海寇根株，倘錢糧不給，恐悞事機，……，特下詔旨招降」[110] 成功的以武力盪平臺灣，[111] 以及到他如何處理鄭克塽[112] 等重大治道決策。

---

[106] Pei Huang, *Autocracy at Work: A Study of the Yung-cheng Period, 1723-1735*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87-190.

[107]（法）白晉著；馬緒祥譯，〈康熙帝傳〉，頁218。

[108]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頁B007326。

[109]「我兵進剿臺灣，克取澎湖，澎湖乃臺灣咽喉之地，克取臺灣，即在旦夕」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二十二年潤六月十八日，頁B006978-9。

[110]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頁B007043。

[111]「澎湖既得，正在攻取臺灣」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七日，頁B007013。

[112] 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十日、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十日，頁B007257；第16冊，康熙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一、二十七日，頁B007642-3。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就在相近的時間前後，不只傳諭「每日進講，在各衙門啟奏之後，不免太遲，嗣後改於啟奏前進講，可以從容多講數條，實為有益」，[113] 且關心經筵四書進講的題目，「經筵關係大典」，不只要「俱切君身，此後當兼訓勉臣下之意」，「方有裨於治理」。[114] 他更與牛鈕、張玉書、湯斌等講官進行《易經》元亨利貞等節的「親講」與「進講」的。[115] 確實，東南三藩的八年（1673－1681）反抗勢力既已平定，康熙二十三年，臺灣，作為明帝國的最後佔領地，也成為大清帝國的新版圖，[116] 大清帝國到此時，才完成以軍事完全控制大明帝國版圖。難怪衍聖公孔毓圻記錄康熙訪曲阜孔廟盛事，即四次明白提到康熙帝征服臺灣的「英勇」事蹟，[117] 充分說明康熙帝幸魯與完成征服臺灣的關係。此論述，當不只代表衍聖公的觀點，[118] 其所記錄完成的《幸魯盛典》，事實上是上呈康熙帝過目而為之冠序的，並被收錄於官方的《四庫全書》中的。[119]

確實，康熙帝在終於完成軍事征服明帝國版圖，清帝國統治漢人的軍事基礎，已趨於穩固之際，在其自述包括幸魯在內的〈南巡筆記〉中，是以「四海盪平」、「天下之權統一」[120] 自況的，這正是他決定南巡，並東巡親幸闕里的時機。他親自以漢人的書寫方式，寫成「萬世師表」，作為禮物。

---

[113]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一日，頁B007063。

[114]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日，頁B007067。

[115]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5冊，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頁B007328。

[116] 康熙二十二、二十三年起居注。

[117]（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1，頁3；卷14，頁18、31；卷40，頁15。

[118]（清）張玉書，《張文貞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2冊，卷3，頁30；（清）張英，《文端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9冊，卷39，頁30；雍正帝，《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0冊，卷4，頁5；（清）乾隆五年敕編，《世宗憲皇帝聖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2冊，卷3，頁15。

[119]（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序〉。

[120]（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20，頁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御書的「大典」情境：從親幸祖陵到闕里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康熙帝以「萬世師表御書」欲懸額大成殿及「曲柄黃蓋」二禮物，親幸曲阜孔廟，向孔子行「三跪九叩」禮。除史上仍有少數九位皇上親幸闕里外，康熙帝選用的禮物與禮數，都是中國史上的第一次。此史無前例事件，在儒家發源地的禮儀場所的公開展演，參證主事者康熙帝的《南巡筆記》、陪侍大臣的《起居注》、辦事或耳聞大臣的賦詩頌揚、受訪孔家的《幸魯盛典》與《出山異數》等文獻，它們記錄相同事件，卻隱約蘊含各有角度，庶幾可分辨出在康熙帝與大臣的互動中，在大臣提議、康熙帝的採納部分與自主的裁決間，同時參照康熙帝拜謁發祥故帝陵寢的行為等等，這些角度當可協助了解「「萬世師表」御書」更深層的文化意涵。

康熙二十三年，當了十五年的大清帝國皇帝的玄燁，第一次親幸闕里祭謁孔子的鑿空行為，與康熙帝首創的「親幸發祥故帝陵寢」的「東巡」，有其對比性。二者皆行滿人皇帝的最重禮數—三跪九叩禮，但前者主動，後者則從被動到主動加碼到御書的被稱頌及廣布。

在親幸闕里之前，康熙帝已完成二次的「東巡」，親幸「發祥故地陵寢」。康熙帝畢其一生，計有三次大規模的東巡。[121] 第一次在第十八歲登基時，康熙十年九月三日始，計18天，到九月十九日止，帝三跪九叩拜福陵努爾哈赤及昭陵皇太極。[122] 此康熙登基親幸發祥故地行三跪九叩禮，開啟《康熙起居注》記錄的第一件國家要事，也執行了順治帝未完成的遺願。

康熙帝的第二次東巡謁陵，則在三藩平定之後的祖陵告成禮，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一年五月二日完成，為時80天。康熙帝在三藩之亂雲南平定的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八日，即以滿文密諭奉天將軍安珠瑚稱「今雲南等處俱已底定，天下永歸太平。祭告天地、太廟、社稷畢，復又祭告陵寢。盛京乃祖父初創根本之地，朕不時思念。朕前巡幸，未至永陵，至今悔恨。今若幸彼，必至

---

[121] 丁海斌，《清代陪都盛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7），頁229-233。

[122]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冊，康熙十年九月十九日，頁B000009；（清）張玉書等奉敕編，〈康熙九年九月初二諭禮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2，頁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祖輩舊址觀看」。[123]

兩個多月後，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康熙帝終於以「雲南底定，海宇蕩平，前詣永陵、福陵、昭陵告祭」。[124] 三藩平定，康熙帝的「東巡二首并序」，直言三藩平定與第二次「東巡」的關係：

> 八年征動喜見澄平，緬想祖宗功 ，禮宜躬謁陵廟以告成功，爰於二月十五日命駕東巡。[125]

康熙帝於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謁孝陵；[126] 二十一年三月四日謁福陵及昭陵；二十一年三月九日謁永陵。[127] 康熙帝遠程親謁四祖陵，不只皆行三跪九叩禮，更寫數封奏疏及時向在紫禁城的祖母報告。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即以「躬詣陵寢」概括東巡的核心目的，而須暫別聖祖母。在他三月四日的謁福昭陵，皇帝於三月五日即馳書告聖祖母已畢祭告事，所謂「仰見祖宗創立鴻基，庇蔭子孫不淺也」。[128] 三月九日將謁永陵前，已在三月八日先向祖母馳書預告，「今者福陵、昭陵告祭方畢，擬初九日率領諸王大臣往謁永陵」。三月十三日「十一日，詣永陵告祭，環視地形山迴水繞佳氣鬱蔥真是興王基業也，茲因大典已畢，敬想祖宗開疆非易」。康熙帝的敬祖與聖祖母的親情，滿人的宗族認同，自然流露，溢於言表。

---

[12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帝墨筆密諭〉，《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7。

[124]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2冊，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頁B005677-8。

[125] （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36，頁1；根據起居注即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五月五日為康熙帝第二次東巡。

[126]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2冊，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頁B005680。

[127]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2冊，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九日，頁B005703。

[128] （清）張玉書等奉敕編，〈康熙九年九月初二諭禮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15，頁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相對的，康熙帝的「親幸闕里」，則是在大清帝國終統東南，征服臺灣完成之際，有著從被動到主動親自規畫到破格演出的過程。經歷著從二十三年初的大臣提議中的「選項」之一，[129] 到九卿會議尋求古例的「似可行」到「乘便致祭」到「應致祭」，經近一年的大臣援引史上帝王例證中，到康熙帝自主的打破自己在16歲時只在太學，可能是被安排的「二跪六叩」，到親赴闕里，向孔子「三跪九叩」史無前例的演出。

確實，從康熙帝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開始，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回宮止[130]的出巡，根據《南巡筆記》，康熙帝是自稱為「南巡」[131] 的，且將訪闕里事，列為「南巡」的重要事項之一。顯然康熙有意以不同的稱呼，將與漢人傳統有關的事務，與東北謁祖陵的滿人認同，賦詩自稱「東巡」，[132] 是有著鮮明的區分意識的。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且維持滿人季節性遷移的生活習慣，常在夏季漢初秋巡幸塞外承德和木蘭。康熙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甫近20歲的年輕皇帝，有太皇太后一行人隨行到赤城後，直至三月二十九日始過八達嶺、回到紫禁城。[133] 這種滿族的季節性遷居，[134] 離紫禁城長達二個月生活方式，在起居注、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也是有名的理學家及康熙的經筵日講制度的催生者—熊賜履（1635－1709）眼裡，自然升起價值觀的衝突，在皇帝回京後的第九天，這位年長19歲的漢臣不免連帶對去年的第一次東巡一齊上奏，批評：

昨年皇上謁陵，大典也。今年同太皇太后幸赤城湯泉，至孝也。

---

[129] 康熙帝稱「請行封禪及巡狩燔柴諸典禮者」(〔清〕張玉書等奉敕編，〈南巡筆記〉，《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20，頁3)；孔毓圻則直指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吏科給事中王承祖的疏請，(（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1，頁3。)

[130]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7冊，頁B008346、B008479。

[131] （清）張玉書等奉敕編，〈南巡筆記〉，《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20，頁3。

[132] （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36，頁1

[133]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 康熙朝》，第1冊，康熙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二十九日，頁B000125、B000188。

[134]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話鋒一轉，不只提出老百姓的批評：

但海內未必知之，皆云萬乘之尊，不居法宮，常常遊幸關外。

更提出他的勸戒：

嗣後請皇上節巡遊。

雖然年輕的皇帝說「知道了」。皇帝在同年，又作了為期約20天的小型的東巡幸與謁陵。從十一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九日，與太皇太后又幸遵化溫泉等，其中八月二十五日且謁孝陵行三跪九叩禮。[135]

（一）滿州帝的「南巡」與漢臣的「東巡狩」

漢臣如熊賜履對皇帝滿人認同，往東北的頻繁「關外巡遊」的不滿，在三藩平定、臺灣已征服之際，二位漢臣終於把握大好時機，於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建請年輕的滿人皇帝行漢人古老傳統的盛世的「皇上東巡」。此「東巡」，與康熙帝的「東巡」不只是滿族與漢人地理方位概念的不同，更是滿漢傳統所賦予的內涵的差異。難怪康熙帝稱漢人的「東巡」為「南巡」。

漢臣疏請「東巡」，早在幸闕里的約十個月前中央已在商議中，足見皇帝的第一次被納入漢禮東巡的慎重其事。疏請康熙帝東巡的二位漢臣，一為翰林院編修曹禾，引《史記》封禪書疏請封禪泰山；一為吏科掌印給事中王承祖疏請倣古帝之巡狩，引《尚書》舜典虞帝東巡幸東方祭泰山及史冊漢高至魯以太牢祀孔子事。[136] 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皇帝交由九卿會議先商議評估，終選擇王

[135]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冊，康熙十一年四月九日，頁B000389。

[136]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2，頁3。（清）乾隆十二年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卷136，頁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承祖議，[137]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皇帝神速定案，不採封禪議。[138]

（二）萬世師表的皇帝祭儀情境：從「乘便」到「大典」，從「二跪六叩」到「三跪九叩」

但由於皇帝親幸事關禮數問題，史無明確記載，行前的三個多月間，相關單位繼之研議中。自二十三年五月十七日禮部工部已進而關注祭器樂器的禮制問題，議請依康熙八年康熙為太子時幸太學的釋奠禮，行文衍聖公備辦。二十三年九月七日更由禮部派太常寺官騎驛馬赴闕里查看禮樂器是否備齊。二十三年九月八日皇帝更主動提出要九卿會議商議「東巡禮數」。二十三年九月十日九卿會議居然作出驚人地提醒。虞舜東巡，岱宗致祭，「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俱係巡歷所至，乘便致祭，原非特行往祀」。祭泰山及孔子，對虞舜及漢高祖而言，只是東巡為主的「乘便」，而不是專程。因此前議備辦的禮數，可以停止，只依「本處祀典致祭即可」。[139]

以上對康熙帝幸闕里事九卿會議在援引古制中所得的結論是「乘便」，依康熙八年康熙帝幸太學的禮數即可。查幸太學，確切的時間為康熙八年四月丁丑，親釋奠，「步進先師位，行二跪六叩頭禮」。[140]

顯然，九卿會議的建議，與康熙帝親幸闕里所展演的「三跪九叩」，實大異其趣。這種行大禮的決定，我們判斷很可能是出自康熙帝的自主操作，九卿會議的自古乘便說，康熙帝正可基於此，決定其史無前例之行。《起居注》記錄他在接獲九卿會議的結論時，已在隔日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他的回應雖是「這所議似可行」，很可能是對九卿會議結論的門面話。似也引起近臣的不解，《起居注》又記康熙帝向十二位在場候旨的滿漢近臣說明。可惜未明載內

---

[137]（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2，頁12。

[138]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6冊，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頁B007807-8。

[139]（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2，頁16。

[140]（清）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28，頁18-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容，只說明珠等聽完皇帝的解釋，從不解到豁然開朗。[141] 看來，這種皇帝心中所決定的而事實上後來已經作的史無前例的禮數，在行前可能仍未對近臣公開明說，起居注也隨之無從紀錄，皇帝有著與九卿會議很不同的決議。

因此，《起居注》雖在距離南巡開始只有六天的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紀錄，「方得豁然」的明珠上奏提醒「東巡致祭闕里」的皇上，「似應上親奠酒，賜衍聖公等書籍及加賞賚」時，皇上的回答已顯示端倪。「致祭先師孔子禮儀，賞賚衍聖公等之事，所關緊要，爾等會同翰林院堂官及原任翰林院學士陳廷敬、庫勒那等詳議」。[142] 看來，康熙帝是很重視，並把事關緊要的幸闕里的禮儀及禮物要事，由較外部的九卿會議轉託付更儒學傾向的親信專責研議。

僅就康熙帝御製詩文集所收錄皇上給陳廷敬（1638-1712）的皇帝幸魯前的有關儒學的上諭中，已足以例證皇帝對其的儒學素養的倚重。陳廷敬在康熙十六年即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為皇帝進講內聖外王齊治之道。皇帝於五月二十八日上諭，欲其更直言勿隱，以助皇帝進修之意。[143] 康熙十七年閏三月二十一日，康熙帝還因五台山送的地方名產分享給陳廷敬。[144]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乙巳，陳廷敬更撰太廟祭祀雅樂十四章，為康熙帝所讚賞採用。[145] 最值得注意的是，九卿會議建議皇帝行使康熙八年康熙帝幸國子監行二跪六叩禮，並頒布康熙八年御旨扁額（圖33），[146] 時陳廷敬及致謝的衍聖公孔毓圻皆在場，陳廷敬即在彝倫堂進講《尚書》。[147] 康熙十六年，《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出刊，

---

[141] 九卿會議「皇上東巡，宜乘便致祭泰山之神及闕里孔廟」的結論，經滿漢五位大學士（覺羅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政治、宋得宜）、七位學士（石柱、麻爾圖、圖納、席爾達、王鴻緒、范承勳、牛鈕）以折本請旨。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7冊，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頁B008280。

[142]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7冊，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頁B008319。

[143] （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6，頁5。

[144] （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7，頁7。

[145] （清）愛新覺羅胤禛（清世宗），《聖祖仁皇帝聖訓》，卷21，頁3。

[146] 王琳琳，《北京孔廟國子監匾聯考辨》，頁136。

[147] （清）梁國治等奉敕撰，《欽定國子監志》，卷8，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0冊，頁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即為陳廷敬所校勘的，在此次二十三年康熙帝幸魯時，更被擇選成康熙帝給衍聖公的禮物。[148]

至於庫勒納，康熙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康熙帝便給他上諭賜御書。[149] 同年十月丁未，康熙帝御懋勤殿，親講易經噬嗑卦辭，講官庫勒納，即進所撰乾坤二卦總論，得到讚賞。[150] 作為康熙帝給衍聖公的禮物《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及十九年出刊的《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庫勒那等更是奉敕編的。[151] 推測，康熙帝送給衍聖公的禮物，應是皇帝指定二位的擘畫，而經皇帝首肯付諸實行的，可能在行前已有定案，而來得及行前準備的。

至於皇帝責成陳廷敬庫勒納詳議的「致祭先師孔子禮儀」？《起居注》及陳廷敬文集，雖未明載。但孔毓圻已於九月二十四日在闕里收到奉旨皇上尊禮先師，應行「三跪九叩頭禮」，[152] 如此皇上親幸闕里的「大典」，顯然在九月二十八日皇上出發南巡前已定案。

查皇帝的三跪九叩禮，這種不取九卿會議「二跪六叩」禮的建請，皇帝對孔子的最極致的禮敬行為，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就大清皇帝而言，是第一位大清皇帝向孔子行三跪九叩禮。羅友之認為三跪九叩禮是滿人「借自儒家」的。[153] 這種看法，似乎難以說明下述現象。

儒家經典《周禮》春官大祝[154] 有「九拜」，歷來經典注疏對九種不同身分與場合的禮拜的具體儀式多所討論，但就名稱上，「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肅拜」論，沒有稱為「三跪九叩」或「三跪九拜」的。

---

[148]（清）梁國治等奉敕撰，《欽定國子監志》，卷51，頁1。

[149]（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勒納等〉，《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11，頁1。

[150]（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5，頁6。

[151]（清）永瑢、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4，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冊，頁10。

[152]（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3，頁5。

[153]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p. 238.

[154]（漢）鄭玄注、（唐）陸德明疏、賈公彥音譯，《周禮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0冊，卷25，頁19-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值得注意的是，三跪九叩禮並沒有見於清代以前的文獻中，以「三跪九叩」關鍵詞查詢四庫全書的電子版時，出現的41本書，全都是清朝的；以「三跪九拜」出現的，為八本書，也都是清代的。

特別是與清代禮儀關係最深的明代，《明史》不見有三跪九叩或三跪九拜禮，皇帝既不親祀先師，更不親幸闕里，更不用說行三跪九叩禮了。《明史》禮志所歸納的吉禮有兩種儀，是「上香禮」及「拜禮」。天子親祀的為「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為七種「大祀」中的四種，中、小祀皆遣官祭祀。祭先師則屬「中祀」，祭帝王陵廟則傳制特遣。[155] 拜禮，在執行中，往往隨不同身分、不同場合，從一拜到十二拜不等，明太祖祭天以其父仁祖配天，在洪武七年，定十二拜禮。

相對的，三跪九叩禮，不只成為清代禮書[156] 的重要內涵，更在皇帝親幸的有限的大禮情境中出現，特別是祭拜的對象往往是很滿族認同的。如皇帝登基禮的謁祖陵祭。康熙帝行「三跪九叩」禮，即是在康熙八年登基時，赴東北祭拜其祖先三陵，永陵、福陵與昭陵。[157] 這種重大歷史行為與禮敬，成為清代起居註冊第一本康熙朝開始記錄的第一件大事的主要內容。如長白山望祀典，在康熙帝第二次東巡時，高士奇隨行，記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壬申，至烏拉雞陵時，皇上乘驢率皇太子等至江干，「望長白山，行三跪九叩禮」。[158] 康熙帝並向聖祖母報告對祖宗發祥地長白山展望祀之典。[159]

「三跪九叩」禮也出現在皇帝親幸滿州舊俗祭神祭天禮。在坤寧宮行正月初一堂子亭式殿元旦行禮儀祭時，皇帝所行之禮數，即為「三跪九叩」禮。[160]

---

[155]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並附編六種》第三冊，〈卷47・志23・禮1・吉禮〉(臺北：鼎文，1982)，頁1225、1238。

[156] 根據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的統計，「三跪九叩」依出現次數多寡前四名依序如下：出現在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則例》197次；清高宗，《皇朝文獻通考》166次；李育鳴、來保，《御製大清通禮》150次；允祹，《欽定大清會典》113次。

[157]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冊，康熙八年九月十九日，頁B000009。

[158] （清）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叢書集成・續編》65史部（上海：上海書局，1994），卷3，頁3。

[159] （清）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15，頁7。

[160] （清）允祿等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1，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7冊，頁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是乾隆帝時為整理康熙帝以來所行之禮，使「滿洲舊俗不致湮沒，而永遠奉行」之禮書。它可遠溯自努爾哈赤時代，滿人入關以前的堂子祭，行三跪九叩禮。[161] 這種三跪九叩禮，到清太宗皇太極時，崇德元年（1636）皇帝行元旦堂子祭，亦行之。[162] 崇德間，皇帝行堂子祭凱旋禮，亦行三跪九叩禮。[163] 雖然順治皇帝在生前無法完成像兒子到東北向祖陵行皇帝的三跪九叩禮，但在順治十年（1653）六月慈寧宮建成，皇太后移居慈寧宮，順至皇帝向皇太后行的即是三跪九叩禮。[164]

看來，康熙帝是以滿人皇帝對祖陵、對皇太后到最滿人信仰的堂子祭的祭天等等的最高禮數，在此次南巡中，擴大到漢人禮儀中，皇帝親自到闕里祭孔，及祭拜明孝陵。[165] 明代的政權，雖在23年前已為清政權所取代，但直至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才真正在軍事上完全征服了明統治領域。南巡，康熙帝以滿人皇帝的最高禮，三跪九叩明孝陵，正是他向明統治領域的漢人子民宣示化干戈為玉帛的時機，他三跪九叩漢人極尊敬的孔子，以萬世師表的漢人書法形式，不只表達30歲滿州帝對孔子的禮讚，更將此來自政治領導者的政治符號，要求制成匾額，史無前例的進駐大成殿。不只向其子民宣示，我是崇儒的滿洲帝，更將這一刻與漢人的儒學崇拜成為永恆。[166]

---

[161]「天聰元年（1627）正月，上率諸貝勒大臣謁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華文書局輯，《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卷3，頁10。

[162]「崇德元年，定每年元旦，皇帝親率清王以下副都統以上，及外藩來朝王等謁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頭禮」（清）乾隆十二年敕撰，〈元日親詣堂子行禮〉，《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61，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5冊，頁37。

[163]「王等凱旋，上率貝勒、貝子公等及文武各官，出征門十里外迎接……上率凱旋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謁堂子，行三跪九叩頭畢。上還 。眾皆退伊桑阿等」〈禮部．儀制司．凱旋儀〉，（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十二輯》（臺北：文海，1992），第716冊，卷45，頁21-22。

[164]（清）巴泰監修，《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卷76，頁22。

[165]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7冊，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二日，頁b008413。

[166] 陳芳妹，〈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兼論康熙與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及傳播〉，頁208-2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康熙帝不只在南巡巡前已確定在大成殿孔子塑像前一展萬世師表之前，定好先向孔子塑像行三跪九叩禮，更在南巡終將幸闕里的前三天，又為一展萬世師表之後親自加碼，使此親幸闕里從九卿的「乘便」提議，蔚為皇帝所策劃的「大典」：皇帝明白說出，即祀禮告成，行禮講學，意欲講明經義，研究心傳，以稱大典，請衍聖公請「學問淹通之士」，擇選他早已背過、研讀過的《大學》之道與《易經》天尊地卑二篇，在孔府詩禮堂講經。[167]

孔家以國子監監生孔尚任及舉人孔尚鉉任講官。孔尚任《出山異數記》，為大成殿之外詩禮堂的講經，其如何增加「大典」的內涵，提供與《起居注》不同的生動而互補的記錄。詩禮堂講經，為大成殿主場之後的另一高潮，皇帝在十一月十五日臨時提出，孔尚任記錄了他親歷的來自朝中主導的部分。包括漏夜趕寫講章、被布置的講堂及排演經筵儀節。十一月十六日夜孔尚任在睡夢中被叫醒，喘息直奔衍聖公東書堂，學士常書及侍讀學士朱馬泰要其撰講綱，至半夜四更始脫稿復命。十一月十七日薄暮，孔尚任被學士孫在豐傳旨更改數字，時已三更。後又與孔尚鉉到有御案、講案、堂中畫屏的詩禮堂學習經筵儀節與進講聲音容止，[168]顯現來自皇帝近臣的對「親幸闕里」大典化的用心。

有關詩禮堂講經一幕，《起居注》更記錄著已在經筵與日講制度下學儒家經典至少十三年的30歲的康熙帝，在親幸「鄒魯聖賢之鄉」，既展現虛心好學，又已具有經學自信的一面。他批評孔尚任講稿，包括經義文字與聲韻：

> 所撰講章文字，尚未得其精微，其篇末排語平仄，音韻無倫。大典關係綦重，不可不加詳酌。

要大學士王熙、學士孫在豐共相更定。

---

[167]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7冊，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十七日，頁B008449-60。

[168] （清）孔尚任，〈出山異數記〉，《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局，1994），頁410-4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從「御書」到「御匾」的傳播與符號化現象[169]

文獻一再告訴我們，這種新的大型的政治性文物，「萬世師表」原版，在成為「匾額」的同時，由於康熙帝的下令懸額殿中及及於各地孔廟，孔毓圻且在闕里立碑，成為傳播到各地御匾的根源。由中央到地方的暢通管道，事實上是由闕里負責承擔中央到地方的轉播站。即中央的內閣九卿詹事科道奉旨「以御書萬世師表匾額摹搨頒天下文廟」旨下，再由「禮部」勅下該撫，在闕里印刷，再由「禮部」頒發各省「巡撫」，再轉行各「州縣學宮」懸置匾額。

地方官及與儒學相關的士紳，是如何使其進入新領地的儒學神聖空間的？清代相關地方志的臺灣府學，雖無留下具體記錄，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的《臺灣府志》則保存清代始建成的諸羅縣學與鳳山縣學可貴的相關文獻，具體提供我們此一代表來自皇帝的文物，在新領地邊疆臺灣，如何成為孔廟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與代表孔子及十哲先賢先儒的牌位一齊被神聖化。康熙丙戌年（1706），羅山西門外始新建成諸羅縣學，仲冬，「萬世師表」御匾在結綵亭、奏鼓樂中，與先師等牌位被「沿途具瞻，直至羅山」（圖34），迎入新宮。

選定的六日庚辰吉辰，「掛御匾於正殿」，縣令宋永清首奉先師牌位，次及四配，儒學教諭孫襄則奉東西十哲等，並行祭儀。圍觀的觀眾，還包括「番民」。紀錄這場「神聖盛況」的教諭孫襄，寫下「番民觀者莫不嘖嘖稱羨」（圖35）。也許是真的相當堂皇熱鬧吧？可惜除了出自儒官外，缺乏來自「番民」角度紀錄的參證，這是一種跨種族的文化交流？或是殖民主義的文化價值觀與文化符號的輸出與強行輸入？但約一百七十年後，光緒五年（1879）在下淡水社的熟番部落，有組「孔子會」的紀錄，為社番子第延師修業，好讓「番童上進有階，文風日盛，萬代留存勿墜」。[170] 這是牡丹社事件後，丁日昌撫番

[169] 本節盡量避免重複，有關此議題的較完整論述，請讀者也一並參考陳芳妹，〈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兼論康熙與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及傳播〉，頁211-217。

[17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私法人事編》，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17種（臺北：臺灣銀行，1961），頁276-2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善後政策下，下淡水放繓社屯千總主導下所成立的組織，[171] 此紀錄，豈是該組織試圖主導熟番部落以追隨儒家價值觀為上進的階梯的成果展現嗎？

無論如何，「萬世師表」御書，此具有高度政治性意涵的新文物，不只入駐闕里大成殿而已，事實上是以「御匾」的形式遍及於清帝國各府州縣及附屬國家的孔廟的。檢視乾隆朝四庫全書所收錄的地方通志，[172]「萬世師表」御匾，從御書書寫的康熙二十三年到二十八年（1684－1689）的五年不等的時間中，已遍佈清帝國。分別出現在包括自稱二十三年已有此御匾的山東、陝西、河南、四川、湖廣、江西、江南及廣東（註111）；二十四年已有的北京國子監、浙江及貴州；[173] 二十五年已有的廣西、山西與雲南；[174] 以及遲至二十八年始有的盛京孔廟。[175] 甚至在清帝國設郡立縣之外但為受封國的琉求，在康熙

---

[171] 感謝匿名審查者的意見。

[172]（清）岳濬等監修、杜詔等編纂，《山東通志》，卷42，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9冊，頁3；（清）劉於義等監修、沈青崖等編纂，《陝西通志》，卷28，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2冊，頁2；（清）田文鏡、王士俊等監修，孫灝、顧棟高等編纂，《河南通志》，卷42，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6冊，頁3；（清）黃廷桂等監修、張晉生等編纂，《四川通志》，卷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9冊，頁2-27；（清）邁柱等監修、夏力恕等編纂，《湖廣通志》，卷21，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1冊，頁1；（清）謝旻等監修、陶成等編纂，《江西通志》，卷17，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3冊，頁1；（清）趙弘恩等監修、（清）黃之雋等編纂，《江南通志》，卷87，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09冊，頁7；（清）郝玉麟等監修、魯曾煜等編纂，《廣東通志》，卷7，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2冊，頁27。

[173]（清）梁國治等奉敕撰，《欽定國子監志》，卷9，頁8；（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編纂，《浙江通志》，卷2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9冊，頁6；（清）鄂爾泰等監修、靖道謨等編纂，《貴州通志》，卷9，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1冊，頁1。

[174]（清）金鉷等監修、錢元昌等編纂，《廣西通志》，卷37，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6冊，頁4；（清）覺羅石麟等監修、儲大文等編纂，《山西通志》，卷3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43冊，頁2；（清）鄂爾泰等監修、靖道謨等編纂，《雲南通志》，卷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9冊，頁5。

[175]（清）和珅等奉敕撰，《欽定大清一統志》，卷3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4冊，頁7；（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卷43，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02冊，頁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十八年（1719）受命為冊封琉球副使的徐葆光，已看到久米村聖廟懸有摹御書「萬世師表」四大字榜書。⑯ 再者，至今越南河內孔廟仍以「萬世師表」御匾為其重要文物之一，而出現在國際觀光旅遊網站中。縱使到現代，我們仍看到目前臺南的「萬世師表」御匾，保留著高懸於大成殿的傳統；同時，中國孔廟仍懸掛「萬世師表」御匾者，所出版圖像的，至少有八間。⑰ 包括山東曲阜、北京、江蘇江陰、浙江黃岩、廣東德慶與番禺、安徽桐城、山西平遙、四川資中等等。在所出版的中國孔廟的圖版角度或不夠完整、影像或不夠清晰的限制下，在何時複製訊息不足之下，若以康熙帝手書原蹟相較，仍提供由「御書」到「御匾」的符號化程度不等的若干訊息。

根據臺灣臺南孔廟及中國八個孔廟現存康熙御匾分析，符號化的不變的核心因素為「萬世師表」四字的基本書風。這是在三百多年的廣佈流傳中，成為較不變被保留的部分。但書法風格細節因素、滿漢御璽書風及與落款的部位關係、落款的書法風格等等，則由落差極大者到極相近者，不一而足，呈現細節元素差異所代表的符號化不等的現象。根據與御書風格等相近程度衡量，依序可例舉四類如下：

第一類與御書關係最淺。如廣東德慶學宮（圖36）⑱ 及番禺學宮，二者「落款」及「御璽」皆已消失，得以證明康熙帝手書的直接證據皆已闕如，顯然此二匾複製版本已與禮部頒發各地者不類，推測來自近現世仿造者。唯「萬世師表」四字與御書書風仍大體相近，但「萬」字最上二個十字相連，又與御書寫法不同。

第二類為與御書關係較第一類稍近者，如山西平遙文廟（圖37）。⑲ 只有落款，但無御璽。

---

⑯（清）張學禮，《清代琉球紀錄集輯》，頁69；（清）徐葆光，《中山傳信錄》，頁213。

⑰ 根據陳傳平，《世界孔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38、56、104、127、148、153、169、203、215所收錄的孔廟圖像中附有萬世師表御匾者。

⑱ 陳傳平，《世界孔廟》，頁148。

⑲ 陳傳平，《世界孔廟》，頁2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三類為與御書關係較一二類更近者，如江蘇江陰文廟（圖38）。[180] 該御匾雖有落款及御璽的部位及關係不對，二者不只分開，御璽還落印在「世」與「書」二字中間上方。

以上三類看來可能已相當缺乏對御書的基本記憶，因此在基本的落款與御璽部分有明顯的失誤。可能已不是來自清代康熙禮部原頒布給地方的版本的直接而忠實的模仿。

第四類為與御書關係最接近，但仍有細節不同者。如臺灣臺南孔廟、中國北京國子監（圖39）及曲阜孔廟（圖40）者。其中曲阜孔廟者，在御璽、落款與御書本身的部位關係等方面，在三例證中出現最明顯的落差。御書鈐印部位在「表」字最高筆畫的左下方，但曲阜孔廟者則在左上方。這種明顯的差異，是臺南孔廟與北京國子監所未見的，豈是因為原清代御匾已在文革被毀，御書原蹟又播遷來臺，在再複製時已缺乏近真版本可供再仿？或是再仿者的一時疏忽？就文字本身而論，御書「萬」字草頭，左右橫筆並未相連。此特點，臺南孔廟與曲阜孔廟者皆保留。相對的，北京國子監的「萬」字草頭則相連（圖41）。何以致此，難道國子監在得到禮部頒佈之際，由「御書」複製成「御匾」的第一版時，已有如此明顯的仿製上的失真？或是國子監版本已非康熙時禮部所頒的「御匾」第一版？

總之，從以上曲阜孔廟的及國子監版本的明顯失真的部分看來，臺南孔廟御匾，與御書最近。守護臺南孔廟數代的方家家族常強調御匾保留自清代，我們從其與御書近真的程度論，顯然出自當世摹寫及雕版高手，對御書特點有甚貼切的認知下所進行的仿製。不過，無可諱言的，三件最重要的御匾，因為已是對「御書」的複製，「御書」的起筆墨色濃鬱、收筆乾擦飛白的書法筆意，在三件「御匾」中皆已不見，顯然這是經過石刻傳拓再版刻成「御匾」所流失的，也是第一版原蹟最珍貴最豐富之所在。

值得再關注的是，「印章」（圖42），特別是強調康熙帝的滿人來源的滿文部分，顯示「御匾」可能出自不是精通滿文的摹手？當時臺灣始入大清版圖，是否仍難以找到既懂漢篆又懂滿文的摹手？甚至連北京國子監御匾的滿漢

[180] 陳傳平，《世界孔廟》，頁1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御璽那一方，也有相近的現象。⑱ 如此看來康熙帝萬世師表御書之流傳於大清帝國中，其與大多數漢人互動的主要部分，是他自己漢化的部分的被較忠實的複製，而他所彰顯滿人特色的滿文，在漢人為主區則可能被在地化吧？

無論如何，康熙帝的「萬世師表」御匾，已成為世界各地孔廟難以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帝的御匾與他所啟動的御匾制度，卻在他曾認為的「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的臺南孔廟，被成功的保留與延續至今。這位才以武力征服臺灣的康熙帝因征服成功，以手書萬世師表「御書」為禮物，親幸曲阜孔廟告成，再以萬世師表「御匾」進駐臺南孔廟。這種征服者的手書，在被石刻、被傳拓、被傳送、被出口、被裝框、被再制、被再呈現、被再懸掛中，空間在轉換，觀眾在轉換，歷史情境在轉換，從戰爭到統治到和平，終沉澱在歷史洪流中，成為古蹟中的文物。

---

⑱ 感謝吳誦芬對御書、臺南孔廟與北京國子監御匾上的滿漢御璽的滿文部分，作了專業分析，本文錄之，以供參考：「相對於故宮御筆匾鈐璽的標準滿文，臺南孔廟匾與北京國子監璽印部分滿文，均有多處訛誤。但是臺南與北京二者的滿文錯誤，則具有相當有趣的差異，前者的錯誤多半屬於減法上的脫漏，後者北京則屬於加法上的畫蛇添足。綜合來說，臺南版問題常是脫漏字牙，北京版的問題則是拉長字尾並且向左撇彎，即使不懂得滿文的人也會發現，視覺上臺南版和故宮御筆版相較之下，每個滿文字的主幹部份顯得較為平順少凸起；而北京版則每個字的末尾部分都拖長了向左彎，即便是故宮御筆匾的第一行最末和第二行第二字都只是呈現刀尖形的收尾，而不是一貫的向左。而對懂得滿文的讀者來說，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第一行最後一字jecen：臺南版「/」形j字頭後的e應有「<」形字牙而無，僅剩字母右邊無法單獨存在的一點，是明顯的脫漏，而緊接在後的「L」形c也被遺落，完全不見。但北京版的則是「/」形j字頭後的e「<」形字牙過長，與緊接在後的「L」形c相連，成為了另一個字母u。另外一處可供說明南減北加的例子，則是第一行第一字onco：臺南版末尾「の」形o因為右方線條不連貫，使得o變成了另一個字母r；其上的「L」形c的線條方折處也不明顯，導致「L」形c誤為「/」形j。北京版則是字頭過分加長，使得o字可能會被誤認為jo，緊接著又是另一次將「<」形字牙過長，與緊接在後的「L」形c相連，成為了另一個字母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餘論：「御書」與漢化與否的爭辯

30歲的滿州帝，在中國東南三藩的反抗平定、剿滅臺灣，完全統治漢人領域後，以萬世師表御書，親幸闕里，三跪九叩。這種史上前所未有的禮物與禮數，是出自日理萬機的皇帝，在十幾年來，在經筵日講制度下，研讀背誦儒家經典、尋求到治道。他甚至要求並也曾親自教導其皇子學經學書法，[182] 他的學儒與尊儒是真誠而深刻的。他在曲阜孔府大成殿與詩禮堂的展演也是很成功的。

康熙臨幸闕里，三跪九叩送御書等，漢儒臣看在眼里，為之感動雀躍而為詩作賦，留在如皇清文穎等[183] 史冊者不少。特別是圍在他身邊的漢近臣。如張英的「展隆儀於稽拜，施殊敬於儒先」；熊賜履的「一一邁前王」、「隆禮兼異數」；姜宸英的「跨漢軼唐禮數殊，稱九拜獻三跪，此事今有古所無」；陳廷敬的「冊書討研，勤逾儒素，遐瞻東魯，慨想宣尼希代曠古，前未有也」；[184] 王士禎的「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大成殿，……古今罕覯之盛舉也」；[185] 勵杜訥的「皇帝命法駕詣闕里，釋奠先師，禮肅九拜，甚曠典也」[186] 等等。

在強調「漢化」學者眼光中，滿州皇帝因系統的採用儒家「漢化」政策，而成功的統治大清帝國的眾多漢人人口，[187] 是有其部分的道理的。相對的，強調「滿州統治者」的角度的研究學者則認為，「當滿族進入明代的統治區時，他們技巧純熟的吸收並利用「儒家禮儀」以幫忙贏得前明官員與群眾的支持」。提醒在皇帝被漢化中，皇帝利用漢化的自主性，以及同時伴隨的更多的

---

[182]（清）愛新覺羅胤禛（清世宗），《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頁3；（清）王士禎，《居易錄》，卷3，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0冊，頁10。

[183]（清）張英，〈駕幸闕里賦並序〉，《文端集》，卷37，頁1。（清）熊賜履，〈駕幸闕里詩〉；（清）姜宸英，〈大駕東巡幸闕里恭紀〉，《皇清文穎》，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0冊，卷59，頁13；卷63，頁20-22。

[184]（清）陳廷敬，《午亭文編》，卷40，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6冊，頁587。

[185]（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4，頁9。

[186]（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25，頁21。

[187] 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pp. 189-1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滿族性的部分。⑱ 此自主性的強調，實則很重要。無論是強調「漢化」或「自主性」，依康熙帝的以御書幸闕里的案例分析，似乎不在兩端的必擇一端，而是有其從被動到自主的轉化過程。這種被動的開始被引入強勢文化的儒學領域中，易於因表面的習經習書法而以皇帝被漢化視之，但康熙帝卻在被動的初學中，努力自主性的轉化，這種自主性往往比滿族特徵的強調挑戰性更大，力道雖隱藏在漢化表象下，實質則更強大，可惜為強調自主性的學界所疏忽。

我們從康熙帝以御書親幸闕里行三跪九叩禮的歷史情境而論，康熙帝的學書法學經，這種非滿州傳統的文化，他是經歷了從被漢化的被動性到自動性，到高明性的結合滿人的的最高禮數與儒學，到自主性的利用漢化的轉化過程。日講經筵謁闕里，事實上都是漢官先提議的，康熙帝卻在被動被引入的開始中，很快取得自主性。

康熙皇帝在康熙十一年，東北謁祖陵並陪祖母幸湯泉歸來，這種極滿族認同的行為，便曾遭導引幼帝經筵日講的漢臣熊賜履的規勸。19歲的皇帝只能答以知道了。到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時年24歲的康熙帝已在懋勤殿，不只在張英面前背誦〈修身〉到〈右傳之九〉章，到〈平天下〉章，更與張英談論更深層的經義及治道問題。包括《大學》由家及國，到內聖外王，到「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到「經權之義」。⑲ 此滿州帝在《大學》厚植的背誦能力及經義的理解，到幸闕里前一天，這位30歲的滿州帝，在「鄒魯聖賢之鄉」，已自然而非常自信地從經義到聲韻，批評孔府所推薦的「學問淹通之士」孔尚任的《大學》講綱。

康熙帝展現在起居注官的眼裡，不免被歌頌記錄「隨舉一篇，皆口誦如流，不遺一字」、「沉潛乎理義，使書與心契」、「於古人書法，一一得其精微，傳其體勢」。這位在起居注官所目睹的「勤政好學，真千古帝王之所不及」⑳ 的滿州帝，正以他從儒學所學所思，用於評判與他共治天下的漢

⑱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p. 198.

⑲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王澈，〈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南書房記注》〉，頁25。

⑳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7冊，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頁B0084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臣，[191] 並用以治理漢子民，一如他自己所言，讀經是為了治道。

康熙帝不只像羅友枝所強調的「利用儒家禮儀」，他更高明的把滿州皇帝獻給祖陵最敬的三跪九叩大禮，應用到純儒家的釋奠禮中，結合御書，獻祭孔子，行漢人自有孔子崇拜以來孔子所未曾接受過的「三跪九叩禮」。而三跪九叩禮，羅友枝卻以為是儒家的。康熙皇帝且更高明的把象徵滿州皇帝與儒家關係的御書，此來自滿州皇帝的政治符號，進駐到千年來漢人所維持的大成殿的純粹的神聖空間中，是孔府大成殿的神聖空間所從未有過的政治符號。與孔廟科舉文化教育系統及孔子崇拜相結合，散佈到大清帝國版圖各地府州縣孔廟中。於是臺灣在康熙二十三年被收入大清版圖，萬世師表御匾也隨之來到臺灣府、諸羅縣、鳳山縣等孔廟中。後二者，目前皆已不見，僅留前者。這個原伴隨著武力勦滅、異族統治的歷史情境的政治符號，正在康熙帝的勤練書法研讀儒學下，在曲阜孔廟大成殿中，在30歲滿州帝的親幸而三跪九叩下，成功的轉化成儒家符號，也轉化成他統治大清帝國各地的文化政治符號。

萬世師表御書與御匾，背後是象徵著大清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與儒家的關係問題。它更伴隨大清皇帝的從順治帝到康熙帝的儒化與治道相結合的刊刻在各地孔廟中，並成為地方學校教育的必要內容，如順治六諭臥碑（圖43）及康熙訓飭士子文（圖44）、[192] 臺南孔廟現即存有同治七年立的順治臥碑等（圖45）[193]。對比與康熙帝同時而稍晚的彼得大帝，[194] 他年輕時親訪歐洲，將歐洲科學教育帶入，成為俄國教育的重要內容，促成俄國比中國早日的西化。康熙帝就在紫禁城內，在學習儒學的過程中對西方解剖學、天文學、醫學等皆有

[191] 康熙帝即當著起居注官面前，批評施琅「粗魯武夫，未嘗學問」。時間在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幸闕里不到三個月前。同年二月一日康熙帝當著起居注官明珠批評崔蔚林「其胸中或有異才偉抱，但觀其品槩及其所作文章亦屬平常，無大勝人處。」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17冊，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頁B008148；康熙二十三年二月一日頁B007678。

[192] 王琳琳，《北京孔廟國子監匾聯考辨》，頁36-48。

[193] （清）六十七、范咸，《重修臺灣府志》（上）（臺北：文建會，2005），卷7，頁363。

[194] 田時塘等，《康熙皇帝與彼得大帝：康乾盛世背後的遺憾》（北京：中央文獻，2000），頁172-1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接觸並欣賞。但他在儒道與治道的結合中，卻選擇將帝國各地的教育鎖在儒家中。臺灣就在被康熙帝盪平，也隨著康熙帝的漢化，在闕里公演滿州帝崇儒之際，也被鎖進儒家教育體系中。陳璸為康熙帝所激賞而擇選為清官的臺灣知府，記載他的重要政績之一，即是在臺南孔廟明倫堂講解上諭十六條。[195] 臺灣的西化教育可能要到統治階層轉化的日治時期了。

當御書的原始歷史情境皆已消失在歷史長流中，御書又在新的臺灣歷史情境中，播遷入存臺灣故宮。另一方面，當大清帝國的臺灣府孔廟，已改變成臺灣臺南孔廟的今日，御匾仍以其儒家的物質文物，伴隨孔子神位，長達三百年以上至今，其所開啟的御匾制度傳統更在臺灣接續尚未停歇。本文不過是對齊聚臺灣的萬世師表御書與早已保留的御匾，試圖重建其已消失的歷史情境於一二。

（責任編輯：謝璿）

[195]（清）丁宗洛，《陳清端公年譜》，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07種（臺北：臺灣銀行，1964），卷下，頁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康熙帝幸闕里前讀經學書大事紀

1636	清朝建國
1644	順治帝入北京，統治中國
1661	鄭成功率軍攻取臺灣
	順治崩，康熙八歲即位
1662	康熙元年，鰲拜四輔臣
1669 康熙八年	康熙親政
1670 康熙九年十月二日	經筵禮初次舉行
1670 康熙九年十月四日	初次日講
1673 康熙十二年	三藩抗清（1673－1681）
1673 康熙十二年二月七日	「隔日進講」成日侍講讀
1673 康熙十二年三月四日	寒暑不輟講
1675 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朕覆講
1677 康熙十六年四月十四日	朕親講
1677 康熙十六年	讀完《四書》（康熙十一年至十六年）
1677 康熙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臨摹草書千字文、百家姓
1677 康熙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賞《淳化閣帖》、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1677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出版《御製日講四書解義》
1680 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讀完《尚書》（十七年二月二十日至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1680 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出版《御製日講書經解義》
1681 康熙二十年	平定三藩
1683 康熙二十二年	攻取臺灣，收入版圖
1683 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出版《御製日講易經解義》
1684 康熙二十三年	臺灣設治，一府三縣
1684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讀完《易經》（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1684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親幸闕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清）丁宗洛
《陳清端公年譜》，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07種，臺北：臺灣銀行，1964。
（清）允祹等奉敕撰
《欽定大清會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允祿等奉敕撰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六十七、范咸
《重修臺灣府志》，臺北：文建會，2005。
（清）孔尚任
〈出山異數記〉，《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局，1994。
（清）孔毓圻
《幸魯盛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巴泰監修
《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
（清）王士禎
《居易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池北偶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永瑢、紀昀等撰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田文鏡、王士俊等監修，孫灝、顧棟高等編纂
《河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法）白晉著；馬緒祥譯
〈康熙帝傳〉，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伊桑阿等纂修
《大清會典》(康熙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十二輯》，臺北：文海，1992。
（清）托津等
《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六十四輯》，臺北：文海，1992。
（清）和珅等奉敕撰
《欽定大清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岳濬等監修、杜詔等編纂
《山東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金鉷等監修、錢元昌等編纂
《廣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阿桂、劉謹之等奉敕撰
《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0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姜宸英
〈大駕東巡幸闕里恭紀〉,《皇清文穎》，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昭槤
《嘯亭續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36編，第6冊，臺北：新興，1984。
（清）倪濤
《六藝之一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孫岳頒等奉敕撰
《佩文齋書畫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庫勒納等撰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收入《四庫全書珍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清）徐葆光
《中山傳信錄》，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306種，臺北：臺灣銀行，1972。
（清）郝玉麟等監修、魯曾煜等編纂
《廣東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馬齊、張廷玉、蔣廷錫監修
《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
（清）高士奇
〈扈從東巡日錄〉，《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局，1994。
（清）乾隆十二年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乾隆十二年敕撰，《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32-63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乾隆五年敕編，《世宗憲皇帝聖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張玉書
《張文貞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張玉書等奉敕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8-129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張廷玉等
《明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97-30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張英
《文端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張學禮
《清代琉球紀錄集輯》，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292種，臺北：臺灣銀行，1971。
（清）梁國治等奉敕撰
《欽定國子監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陳廷敬
《午亭文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傅恆等奉敕撰
《皇清職貢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編纂
《浙江通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
《朝鮮王朝實錄》，首爾特別市：東國文化社，檀紀4290（19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華文書局輯
《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
（清）鄂爾泰等監修、靖道謨等編纂
《雲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貴州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7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黃廷桂等監修、張晉生等編纂
《四川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愛新覺羅胤禛（清世宗）
《聖祖仁皇帝聖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唐）虞世南
《孔子廟堂碑》(廟堂碑唐本，原色法帖選12)，東京：二玄社，1985。
（清）雍正帝
《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熊賜履
〈駕幸闕里詩〉,《皇清文穎》，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趙弘恩等監修、(清）黃之雋等編纂
《江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0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趙明誠
《金石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劉於義等監修、沈青崖等編纂
《陝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漢）鄭玄注、(唐）陸德明疏、賈公彥音譯
《周禮注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謝旻等監修、陶成等編纂
《江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邁柱等監修、夏力恕等編纂
《湖廣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覺羅石麟等監修、儲大文等編纂
《山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4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近人論著

丁海斌
2007 《清代陪都盛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Ding, Hai-bin
2007 *Qingdai peidou chengjing yanjiu* (Studies on the Auxiliary Capital of the Qing Dynasty: Shengji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大總統令
1971 〈孔德成襲封為衍聖公此令〉，《政府公報》，臺北：文海出版社，第1503號（民國9年4月21日）。
Da zongtong ling (Presidential Decree)
1971 "Kong Decheng xifeng wei yansheng gong ci ling (Kung Te-cheng Proclaimed Hereditary Duke of Yansheng)," *Zhengfu gongbao* (Government Gazet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Wen Hai Press Company, no. 1503 (April 21st, 1920).
大總統告令
1971 〈本大總統謹率百官舉行祀孔典禮〉，《政府公報》，臺北：文海出版社，第860號（民國3年9月26日）。
Da zongtong gaoling (Presidential Notice)
1971 "Ben da zongtong jin Shuai baiguan juxing si Kong dianli (I, the President, shall Lead All Officials to Hold a Memorial Ceremony for Confucius)," *Zhengfu gongbao* (Government Gazet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Wen Hai Press Company, no. 860 (September 26th, 1914).
大總統批令
1971 〈政事堂禮制館呈擬訂祀孔典禮〉，《政府公報》，臺北：文海出版社，第830號（民國3年8月27日）。
Da zongtong piling (Presidential Order)
1971 "Zhengshi tang lizhi guan cheng niding si Kong dianli (Ritual Regulations Office of the Administration Chamber Presents a Draft Plan for the Memorial Ceremony for Confucius)," *Zhengfu gongbao* (Government Gazet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Wen Hai Press Company, no. 830 (August 27st, 19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田孝使
1918 《臺南聖廟考》，臺南：高畠怡三郎。
Yamada, Takashi
1918 *Tainan seibyō kō* (Research on the Confucian Temples in Tainan), Tainan: Takahata Yisaburou.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6 〈康熙帝墨筆密諭〉，《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1996 "Kangxidi mobi miyu (Secret Edits Written by the Kangxi Emperor)," *Kangxi chao manwen zhupi zouzhe quanyi*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Imperially Rescripted Manchu Palace Memorials of the Kangxi Period),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孔德懋
1982 《孔府內宅軼事：孔子後裔的回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Kong, De-mao
1982 *Kongfu neizhai yishi: Kongzi houyi de huiyi* (Past Events in the Inner Residence of the Kong Family Mansion: Memories of the Descendants of Confucius),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ress.
王琳琳
2014 《北京孔廟國子監匾聯考辨》，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Wang, Lin-lin
2014 *Beijing kongmiao guozijian bianlian kaobian* (Examination on the Couplet-Inscribed Plaques at the Imperial College in the Beijing Temple of Confucius),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ress.
王澈
1995 〈康熙十七年《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3期，頁3-19。
2001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1期，頁24-27。
Wang, Che
1995 "Kangxi shiqi nian '*nan shufang jizhu*' ("Records of Daily Actions at South Study" in the 17th Year of the Kangxi Reign)," *Historical Archives*, no. 3, pp. 3-19.
2001 "Kangxi shiliu nian shier yue '*nan shufang jizhu*' ("Records of Daily Actions at South Study" in the 12th Month of the 16th Year of the Kangxi Reign)," *Historical Archives*, no. 1, pp. 24-27.
田時塘等
2000 《康熙皇帝與彼得大帝：康乾盛世背後的遺憾》，北京：中央文獻。
Tian, Shi-tang, et al.
2000 *Kangxi huangdi yu bide dadi: Kang Qian shengshi beihou de yihan* (The Kangxi Emperor and Peter the Great: Regrets and Sorrows in the Prosperous Times of the Kangxi and Qianlong Reigns),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Press.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白・特木爾巴根
2012 〈清代蒙譯儒學典籍及其流傳〉，收入黃麗生編，《邊緣儒學與非漢儒學：東亞儒學的比較視野（17-20世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111-155。
Temuerbagen, Bai
2012 "Qingdai mengyi ruxue dianji ji qi liuchuan (Mongolian Translation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Qing Period and Their Circulations)," in Li-sheng Huang, ed., *Peripheral and Non-Han Confucianis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onfucianism in East Asia, 17th-20th Century*,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pp. 111-155.
守屋正彦
2014 《日本の儒教美術》，筑波：筑波大學大學院日本美術史研究室。
Moriya, Masahiko
2014 *Nihon no jukyō bijutsu* (Confucian Art in Japan), Tsukuba: Art and Design, University of Tsukuba.
安部健夫
1971 《清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
Abe, Takeo
1971 *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Ch'ing Period*, Tokyo: Shobunsha.
朱本源
1947 〈論尊孔與民主矛盾〉，《觀察》，第三卷第十期。
Zhu, Ben-yuan
1947 "Lun zunkong yu minzhu maodun (On the Ambivalence between Praise of Confucius and Democracy)," *Guancha* (Observation), vol. 3, no. 10.
朱金甫
1990 〈論康熙時期的南書房〉，《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頁27-38。
Zhu, Jin-fu
1990 "Lun Kangxi shiqi de nan shufang (On the South Study in the Kangxi Reign)," *National Palace Journal*, no. 2, pp. 27-38.
西山松之助
2001 《湯島聖堂と江戸時代》，東京：斯文會。
Nishiyama, Matsunosuke
2001 *Yushima seidō to Edo jidai* (The Yushima Confucius Temple and the Edo Period), Tokyo: Shibunkai.
吳誦芬主編
2017 《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臺北：故宮。
Wu, Sung-feng, ed.
2017 *Teacher Exemplar for a Myriad Generations: Confucius in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Print Through the Ages*,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麗娜等整理
2002 〈訪指導老師談雪廬老人〉,《智燈社創社三十週年社慶特刊》,臺中:中興大學,頁43-44。
Wu, Li-nuo, et al., ed.
2002 "Fang zhidao laoshi tan xuelu laoren (An Interview with the Club Instructor about Venerable Li Bing-Nan)," *Zhidengshe chuangshe sanshi zhounian sheqing tekan* (Special Issue for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Zhi-Deng Club), Taichu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pp. 43-44.
李俊領
2005 〈中國近代國家祭祀的歷史考察〉,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Li, Jun-ling
2005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Sacrifices of Modern China," Master's Thesi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汪士淳
2013 《儒者行:孔德成先生傳》,臺北:聯經。
Wang, Shi-chun
2013 *Ruzhe xing: Kong Decheng xiansheng chuan* (A Confucian's Practices: A Biography of Mr. Kung Te-cheng),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周克勤著;林宛瑩譯
1998 〈戰後國民政府與儒家思想: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收入黃俊傑、何寄澎,《臺灣的文化發展:世紀之交的省思》,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59-90。
Zhou, Ke-qin; Lin, Wan-ying, trans.
1998 "Zhanhou guomin zhengfu yu rujia sixiang: xixue weiti, zhongxue weiyong?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Confucianism in Postwar Taiwan: Western Learning as Substance, Chinese Learning as Means?)," in Chun-chieh Huang and Chi-pen Ho,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pp. 59-90.
周俊宇
2008 〈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Chou, Chun-Yu
2008 "Suzao dangguo zhi min: Zhonghuaminguo guiding jieri de lishi kaocha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Citizens: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n the National Holida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故宮博物院編
2015 《普天同慶:清代萬壽盛典》,北京:故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Palace Museum, ed.
2015 *The World Rejoices as One: Celebrating Imperial Birthday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The Palace Museum.
國民政府令
1972 〈「茲以孔子嫡系裔孫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此令」〉，《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臺北：成文出版社，第1643號（民國24年1月18日）。
Guomin zhengfu l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Decree)
1972 "Zi yi Kongzi dixi yisun wei dacheng zhisheng xianshi fengsiguan, yi terenguan daiyu. Ci ling (This Decree Appoints the Descendant of Confucius in the Main Line of Descent as the Sacrificial Official to Confucius with the Remuneration for Special Political Officials)," *Zhonghuaminguo guomin zhengfu gongbao* (Government Gazet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Chen Wen Publishing Co., Ltd., no. 1643 (January 18th, 1935).
國立中興大學
2006 《興大檔案中的校園變遷》，臺中：國立中興大學總務處文書組。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006 *Xingda dangan zhong de xiaoyuan bianqian* (A Campus in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chives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1993 《故宮書畫圖錄》，第十一冊，臺北：故宮。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993 *Gugong shuhua tulu* (Illustrated Catalog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vol. 11,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張萬興
2012 〈從起居注看康熙帝頒賜御書的政治功用〉，《歷史檔案》，2期，頁85-88。
Zhang, Wan-xing
2012 "Cong qijuzhu kan Kangxidi banci yushu de zhengzhi gongyong (The Kangxi Emperor's Granting of Imperial Writings and Its Political Functions Revealed in the "Notes on Kangxi's Daily Life")," *Historical Archives*, no. 2, pp. 85-88.
張臨生
2013 〈孔德成先生與故宮〉，《故宮文物月刊》，第363期，頁56-65。
Chang, Lin-sheng
2013 "Mr. Kung Te-Cheng and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363, pp. 56-65.
莊吉發
2017 〈繙譯四書—四書滿文譯本與清代考證學的發展〉，《故宮文物月刊》，第412期，頁18-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Zhuang, Ji-fa

2017 "Translating the Four Books: Manchu Translation of the Four Book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aozhengxue (Science of Evidence-based Search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412, pp. 18-27.

許淑華

2006 《雪廬居士佛學思想暨行述研究》，臺北：秀威資訊。

Xu, Shu-hua

2006 *Xuelu jushi foxue sixiang ji xingshu yanjiu* (Study on the Buddhist Thought, Practices, and Writings of Venerable Li Bing-Nan),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陳宇彤

2010 〈北京國子監康熙榜書卧碑考〉,《北京文博》，4期，頁45-49。

Chen, Yu-tong

2010 "Beijing guozihjian Kangsi bangshu wobei kao (Examination on the Lying Stele of School Rules Containing Large Character Writings by the Kangxi Emperor at the Imperial College in Beijing)," *Beijing wenbo*, no. 4, pp. 45-49.

陳東

2006 〈清代經筵制度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

Chen, Dong

2006 "The Research of the Imperial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e Ching Dynasty," PhD Diss., Shandong University.

陳芳妹

2013 〈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兼論康熙與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及傳播〉，《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十一卷第一期，頁199-230。

2017 〈萬世師表御書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故宮文物月刊》，第412期，頁29-39。

Chen, Fang-mei

2013 "The Imperial Plaque 'Model Teacher for All Ages' at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Tainan: with a Discussion of Kangxi and the Form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Standard for Imperial Plaques in the Early Qi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1, no. 1, pp. 199-230.

2017 "Wanshi shibiao yushu zai guoligugongbowuyuan zhanchu (The Exhibition of Imperial Writings of "Teacher Exemplar for a Myriad Generations"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412, pp. 29-39.

陳捷先

1997 〈康熙皇帝與書法〉,《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七卷第一期，頁1-18。

Chen, Jie-xian

1997 "The K'ang-hsi Emperor and Calligraph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17, no. 1, pp. 1-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傳平
2004 《世界孔廟》，北京：文物出版社。
Chen, Chuan-ping
2004 *World Confucian Temple*,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馮明珠主編
2011 《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臺北：故宮。
Feng, Ming-chu, ed.
2011 *Emperor Kangxi and the Sun King Louis XIV: Sino-Franco Encounters in Arts and Culture*,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黃克武
1984 〈民國初年孔教問題之爭論（一九一二～一九一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二期，頁197-223。
Huang, Ko-wu
1984 “Minguo chunian kongjiao wenti zhi zhenglun, 1912-1917 (Controversy over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17),” *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o. 12, pp. 197-223.
黃啟書
2015 〈大正時期臺南孔廟整修之兩位主要人物：枝德二、許廷光〉，《成大中文學報》，第五十期，頁109-140。
Huang, Chi-shu
2015 “Discussion on the Main Characters about the Renovation of Tainan Confucian Temple in the Japanese-Occupied Period,”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o. 50, pp. 109-140.
黃進興
1987 〈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1，頁105-131。
Huang, Chin-shing
1987 “Qing chu zhengquan yishi xingtai zhi tanjiu: zhengzhihua de ‘daotong guan’ (Exploring the Ideology of the Early Qing Regime: A Politicized “Orthodox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8:1, pp. 105-131.
黃麗生
2005 〈治統下的道統：清代八旗官學書院及其學禮學規〉，收入高明士編，《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225-298。
Huang, Li-sheng
2005 “Zhitong xia de daotong: Qingdai baqi guanxue shuyuan ji qi xueli xuegui (The Orthodoxy under Political Legitimacy: Official Schools and Academies for the Eight Banners Members in the Qing Period and Their Academic and Ritual Rules),” in M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hi Gao, ed., *Dongya chuantong jiaoyu yu xueli xuegui*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and Ritual Rules in East Asia),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pp, 225-298.

楊丹霞

2008 〈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5期,頁90-104。

Yang, Dan-xia

2008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s,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the Calligraphy of the Kangxi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5, pp. 90-104.

楊克林編著

1995 《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香港:天地圖書。

Yang, Ke-lin, ed.

1995 *Wenhua dageming bowuguan* (Cultural Revolution Museum), Hong Kong: Cosmos Books.

楊珍

2004 〈蘇麻喇姑研究〉,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古史文存》明清卷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Yang, Zhen

2004 "Sumalagu yanjiu (Research on Sumalagu)," in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 *Gushi wencun* (Preservation of the Texts of Ancient History), Ming Qing juan (Ming-Qing Volume), Part 2,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楊家駱主編

1982 《新校本明史並附編六種》,臺北:鼎文。

Yang, Jia-luo, ed.

1982 *Xinxiaoben Ming shi bing fubian liuzhong* (Newly Complied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with Six Additional Volumes), Taipei: Ding wen.

葉高樹

2002 《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板橋:稻鄉。

Yeh, Kao-shu

2002 *Qingchao qianqi de wenhua zhengce* (Cultural Policy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anqiao: Daw Shiang Publishing Co., Ltd..

鄒愛蓮主編

2009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

Zou, Ai-lian, ed.

2009 *Qingdai qijuzhu ce: Kangxi chao* (Notes on Qing Emperors' Daily Life: The Reign of Kangx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1961 《臺灣私法人事編》,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17種,臺北:臺灣銀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ank of Taiwan's 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ed.

1961 *Taiwan sifa renshi bian* (Collection of Taiwan Private Law: Personnel), in Taiwan Literature Series, vol. 117, Taipei: Bank of Taiwan.

趙爾巽

1981 《清史稿》臺北：鼎文。

Zhao, Er-xun

1981 *Qing shi gao* (Provisional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Taipei: Ding wen.

劉家駒

2002 《儒家思想與康熙大帝》，臺北：臺灣學生。

Liu, Jia-ju

2002 *Rujia sixiang yu Kangxi dadi* (Confucianism and the Great Kangxi Emperor),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蔡忠鉅編纂

1997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零）一至三月份》，臺北：國史館。

Cai, Zhong-ju, ed.

1997 *Zhonghuaminguo shishi jiyao (chugao) Zhonghuaminguo sanshijiu nian (yi jiu wu ling) yi zhi san yue fen* (First Draft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Chronic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January to March, 1950), Taipei: Academia Historica.

韓行方

1994 〈旅順博物館藏康熙帝臨帖與手書墨跡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1期，頁80-85+42。

Han, Xing-fang

1994 "Lushun bowuguan cang Kangxidi lintie yu shoushu moji kaolue (Brief Examination on the Kangxi Emperor's Calligraphic Copies and Handwritings Collected in the Lüshun Museum),"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1, pp. 80-85+42.

魏慶友

2016 《稷下雪廬老人》，臺中：雪心文教基金會。

Wei, Qing-you

2016 *Jixia xuelu laoren* (Jixia Xue-Lu-Lao-Ren), Taichung: Shiueshi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

Ho, Ping-ti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pp. 189-195.

Huang, Pei

1974 *Autocracy at Work: A Study of the Yung-cheng Period, 1723-1735*,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awski, Evelyn S.
1998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鄭維真
〈從康熙到小英 臺南孔廟擁15御匾〉,《世界日報》2016-11-05：https://www.worldjournal.com/4515894/article-從康熙到小英-台南孔廟擁15御匾/，檢索日期：2018.03.07。
Zheng, Wei-zhen
"From Kangxi to Tsai Ing-wen: The 15 Imperial Plaques Owned by the Tainan Confucian Temple," *World Journal*, November 5,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orldjournal.com/4515894/article-從康熙到小英-台南孔廟擁15御匾/ on March 7, 2018.
洪瑞琴
〈臺南孔廟再添總統匾額 蔡英文頒「德侔道昌」〉,《自由時報》2016-11-05：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877420，檢索日期：2018.03.07。
Hong Jui-chin
"The Addition of a Presidential Plaque 'De Mou Dao Chang' Conferred by President Tsai Ing-wen to the Tainan Confucian Temple," *Liberty Times*, November 5,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877420 on March 7, 2018.
王雯慧
〈中國儒家文化的傳承——孔德成〉,《中興大學鹿鳴電子報》，第18期（20090826）：http://deer.nchu.edu.tw/2009/08/中國儒家文化的傳承——孔德成/，檢索日期：2017/8/21。
Wang, Wen-hui
"Heritage of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e: Kung Te-cheng," *E-Newsletter of the Deer Cultural Heritage Center, NCHU*, no. 18, August 26,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deer.nchu.edu.tw/2009/08/中國儒家文化的傳承──孔德成/ on August 21, 20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臺南孔廟大成殿八大大清皇帝御匾。作者自攝。

圖2　臺南孔廟大成殿康熙「萬世師表」御匾被其它御匾所掩。作者自攝。

圖3　大正七年（1918）重修孔廟捐資銅碑　臺南孔廟。作者自攝。

圖4　「萬世師表」御匾被誤認為屬順治帝。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臺南：高畠怡三郎，1918），頁186-187。

圖5　裕仁皇太子臺南孔廟參祭照片　臺南孔廟以成書院。作者自攝（感謝臺南孔廟方先生提供）。

圖6　民國三十九年（1950）臺南孔廟「有教無類」匾　臺南孔廟大成殿。作者自攝。

圖7　民國一〇五年（2016）臺南孔廟「 侔道昌」匾　臺南孔廟大成殿。作者自攝。

圖8　曲阜孔廟萬世師表御匾於文革間被焚毀。楊克林編著，《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香港：天地圖書，1995），頁160-161。

圖9　康熙萬世師表御書。作者自攝；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編，《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三四週年誕辰釋奠暨以成書院一五〇週年特刊》（臺南：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1984），頁13；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臺北：故宮，2017），圖版31。

圖10　民國38年押運孔府25件文物赴臺灣之公文　孔德成文物紀念館。中興大學智燈社，《智燈社創社三十週年社慶特刊》（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02），頁35。

圖11　萬世師表御書等文物運送時所使用的皮箱　孔德成文物紀念館。作者自攝。

圖12　未經故宮重新裝裱之御書。故宮書畫處張碧涼科長提供。

圖13　萬世師表御書兩側接補痕跡。作者自攝。

圖14　刺繡康熙「萬壽無疆」匾。《普天同慶：清代萬壽盛典》（北京：故宮，2015），圖版1。

圖15　康熙帝御書「功存河洛」碑　北京國子監。繩博攝影、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圖16　康熙帝御書「昌明仁義」碑　北京國子監。繩博攝影、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圖17　康熙帝御書「嵩高峻極」碑　北京國子監。繩博攝影、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圖18　康熙帝御書「靈濆安瀾」碑　北京國子監。繩博攝影、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圖19　江蘇常熟虞山劍門風景區「煙嵐高曠」石刻及拓本。張軍攝影、李政提供。

圖20　清初　康熙帝便裝寫字像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中法文化與藝術的交會特展》（臺北：故宮，2011），圖版1B-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1 萬世師表御書「表」字。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圖22 萬世師表御書「萬」字。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圖23 萬世師表御書「表」（左）與顏真卿〈多寶塔碑〉「表」字（中、右）比較。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唐）顏真卿，《多寶塔碑》（東京：二玄社，1974）。

圖24 萬世師表御書「世」（左）與歐陽詢〈皇甫誕碑〉「世」字（中、右）比較。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唐）歐陽詢，《皇甫誕碑》（東京：二玄社，1974）。

圖25 康熙甲子孟冬敬書。作者自攝。

圖26 萬世師表御書「子」、「書」（左）與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子」、「書」字（中、右）比較。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東京：二玄社，1974）。

圖27 廣運之寶璽印。作者自攝。

圖28 乾隆廣運之寶璽。鄭珉中主編，《故 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璽印》（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頁209。

圖29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 清康熙16年內府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陳芳妹，〈萬世師表御書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故宮文物月刊》，第412期（2017），圖12。

圖30 《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冊。

圖31 《御製日講易經解義》〈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冊。

圖32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8冊。

圖33 康熙八年（1669）御旨匾額 北京國子監。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圖34 「御書「萬世師表」御匾，結綵亭、奏鼓樂，沿途具瞻，直至羅山」。孫襄，〈諸羅學文廟記〉，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10。檢索自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圖35 「番民觀者莫不嘖嘖稱羨」。孫襄，〈諸羅學文廟記〉，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10。檢索自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圖36 廣東德慶學宮「萬世師表」匾與萬世師表御書比較。陳傳平，《世界孔廟》（北京：文物，2004），頁148；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圖37 山西平遙文廟「萬世師表」匾與萬世師表御書比較。陳傳平，《世界孔廟》，頁202；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圖38 江蘇江陰文廟「萬世師表」匾與萬世師表御書比較。陳傳平，《世界孔廟》，頁104；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圖39 北京國子監「萬世師表」匾與萬世師表御書比較。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圖40 曲阜孔廟「萬世師表」匾與萬世師表御書比較。孔祥林主編，《孔子故里：東方智慧的文化殿堂》（杭州：浙江人民美術，2000），頁67；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1　萬世師表御書（左）、北京國子監萬世師表匾「萬」字（右）。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圖42　臺南孔廟廣運之寶御書璽拓本、北京國子監御匾璽、萬世師表御書璽。作者自攝；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圖43　北京國子監順治九年（1652）六諭滿漢臥碑。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圖44　北京國子監康熙訓飭士子文碑　康熙四十一年（1702）。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圖45　臺南孔廟六諭臥碑　同治七年（1868）立。作者自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　臺南孔廟大成殿八大大清皇帝御匾　作者自攝



圖2　臺南孔廟大成殿康熙「萬世師表」御匾被其它御匾所掩　作者自攝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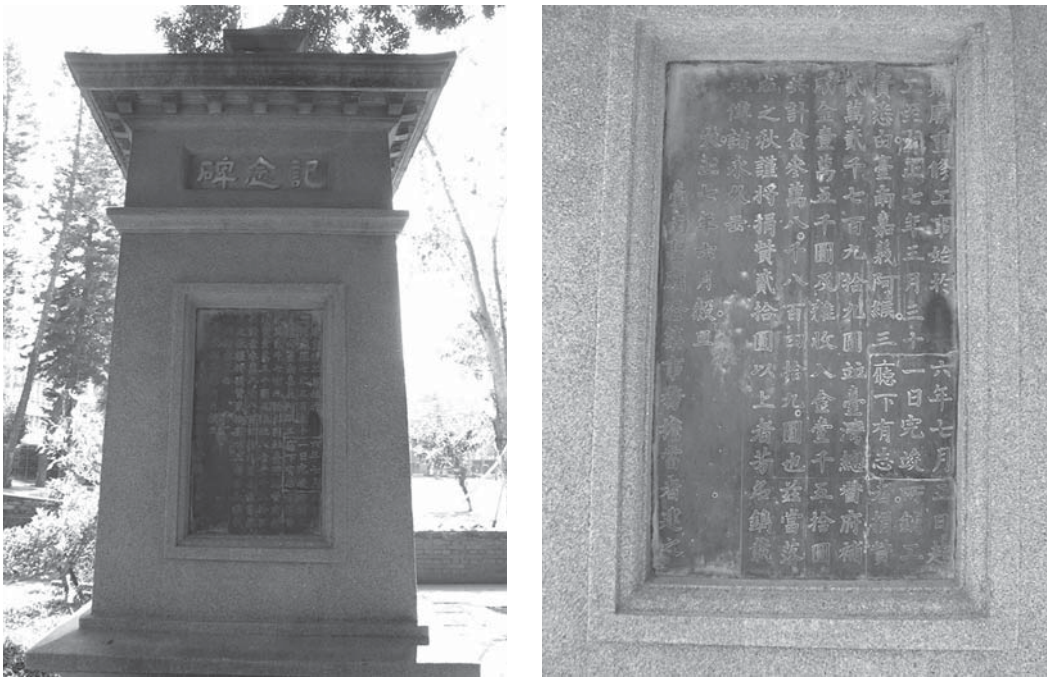


圖3　大正七年（1918）重修孔廟捐資銅碑　臺南孔廟　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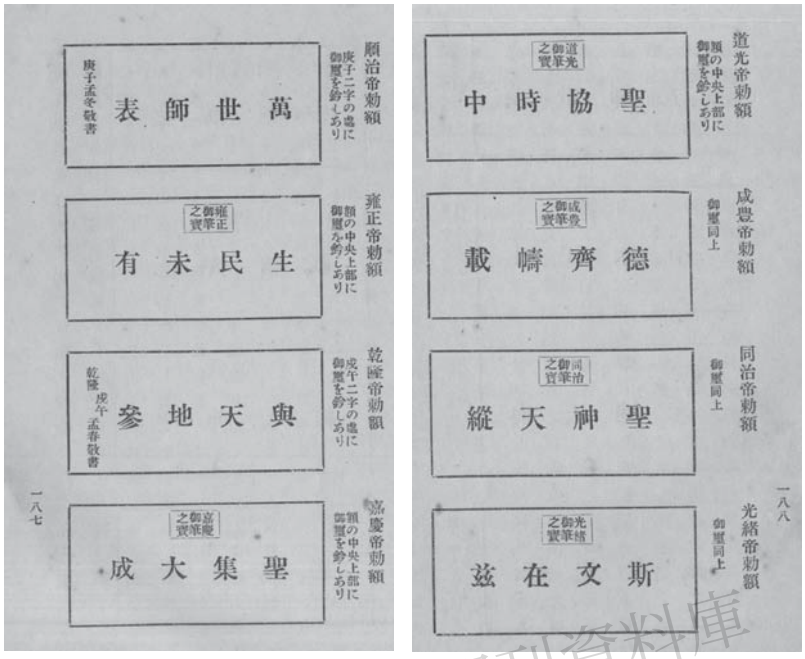


圖4　「萬世師表」御匾被誤認為屬順治帝　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頁186-1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　裕仁皇太子臺南孔廟參祭照片　臺南孔廟以成書院　作者自攝（感謝臺南孔廟方先生提供）



圖6　民國三十九年（1950）臺南孔廟「有教無類」匾　臺南孔廟大成殿　作者自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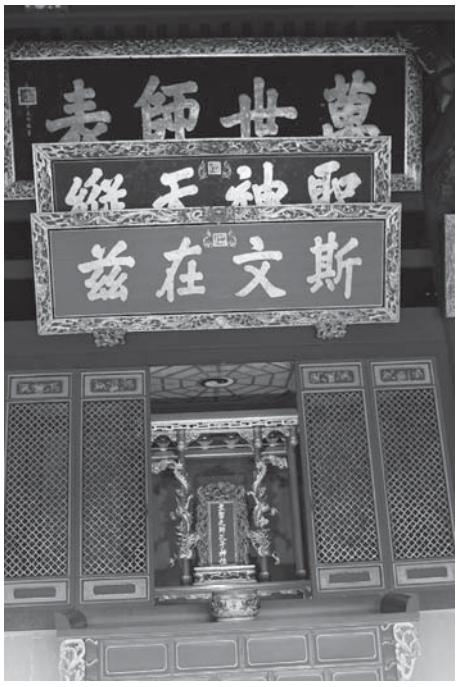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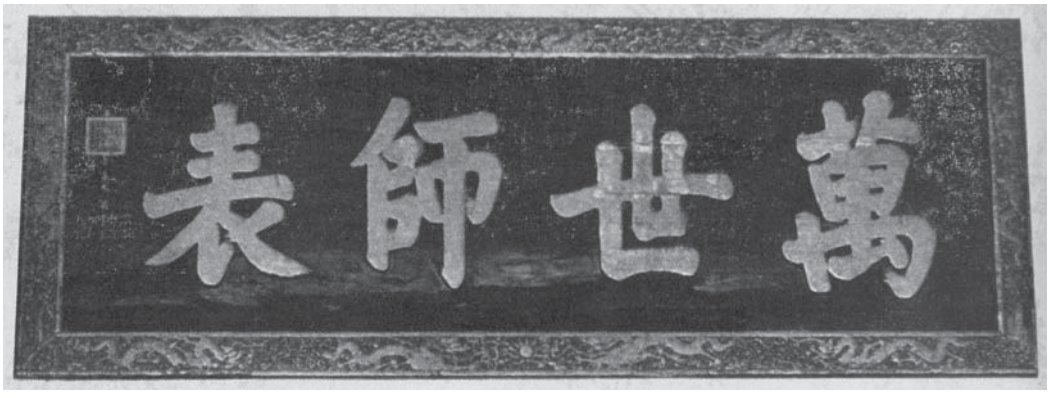
圖7　民國一〇五年（2016）臺南孔廟「德侔道昌」匾　臺南孔廟大成殿　作者自攝



圖8　曲阜孔廟萬世師表御匾於文革間被焚毀　楊克林編著，《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頁160-161。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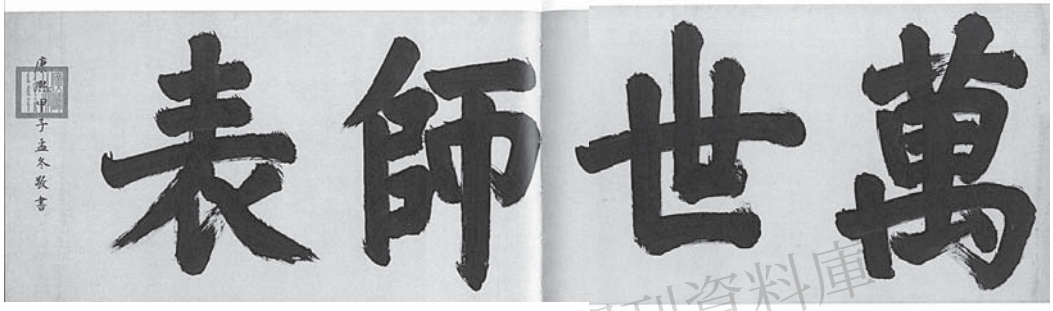


圖9　臺南孔廟康熙萬世師表御匾與御書　作者自攝；《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三四週年誕辰釋奠暨以成書院一五〇週年特刊》，頁13；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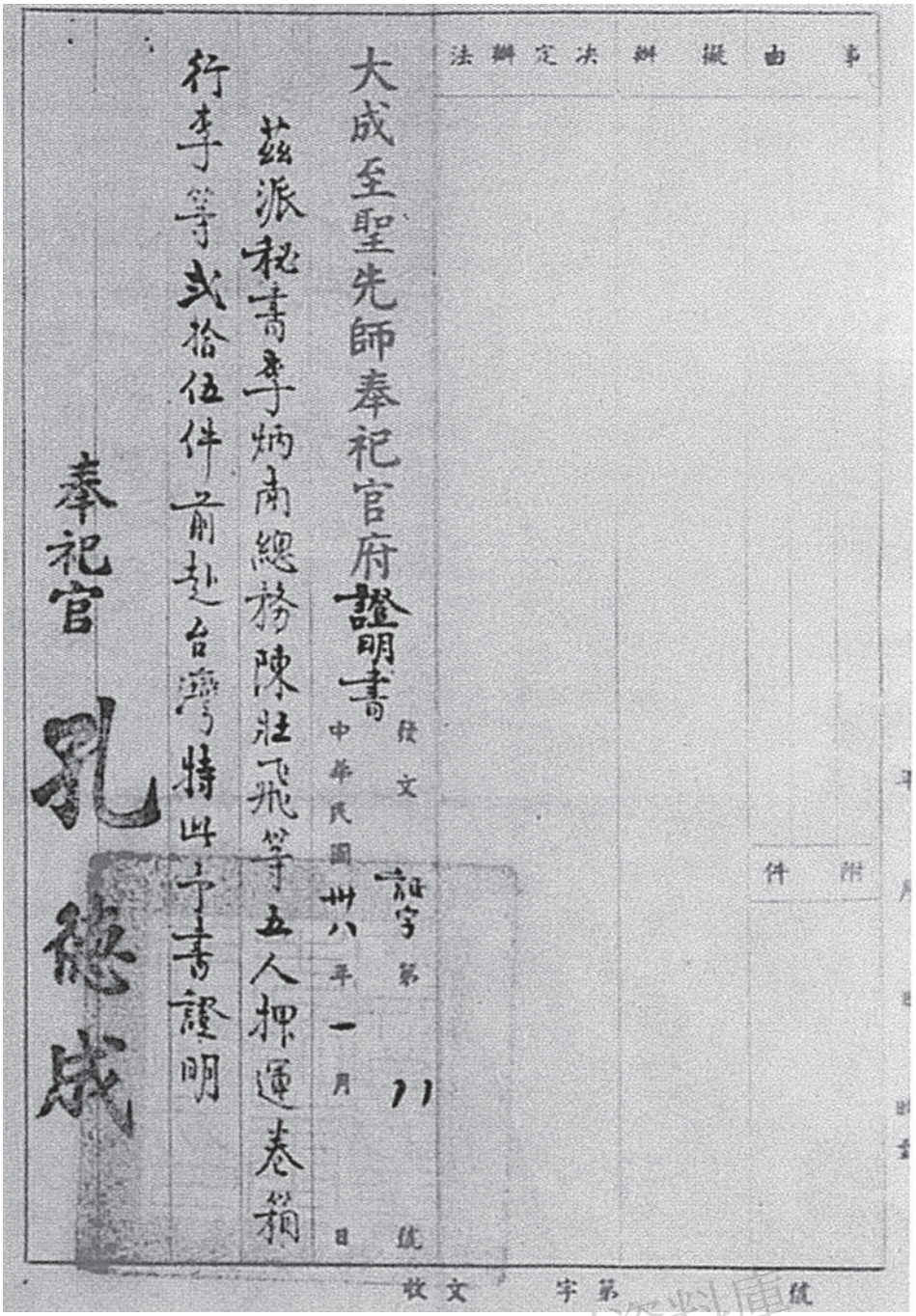

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府證明書
茲派秘書李炳南總務陳壯飛等五人押運卷箱
行李等貳拾伍件前赴台灣特此予書證明
奉祀官 孔德成

圖10　民國38年押運孔府25件文物赴台灣之公文　孔德成文物紀念館　中興大學智燈社，《智燈社創社三十週年社慶特刊》，頁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1 萬世師表御書等 文物運送時所使用的皮箱 孔德成文物紀念館 作者自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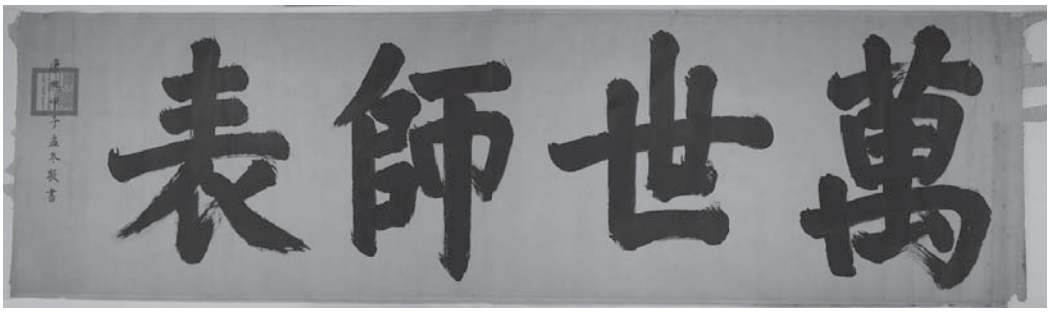


圖12　未經故宮重新裝裱之御書　感謝故宮書畫處張碧涼科長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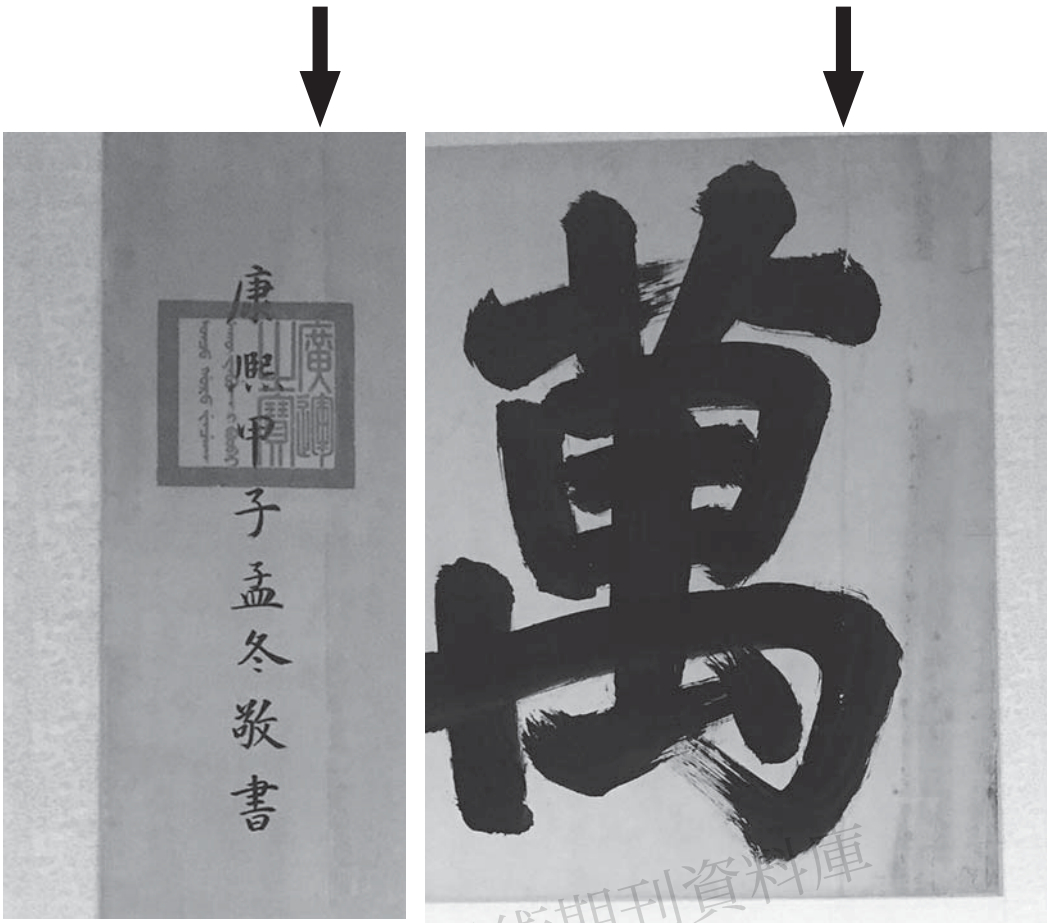


圖13　萬世師表御書兩側接補痕跡　作者自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4　刺繡康熙「萬壽無疆」匾　《普天同慶：清代萬壽盛典》，圖版1



圖15　康熙帝御書「功存河洛」碑　北京國子監　繩博攝影、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6 康熙帝御書「昌明仁義」碑 北京國子監 繩博攝影、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圖17 康熙帝御書「嵩高峻極」碑 北京國子監 繩博攝影、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8 康熙帝御書「靈濆安瀾」碑 北京國子監 繩博攝影、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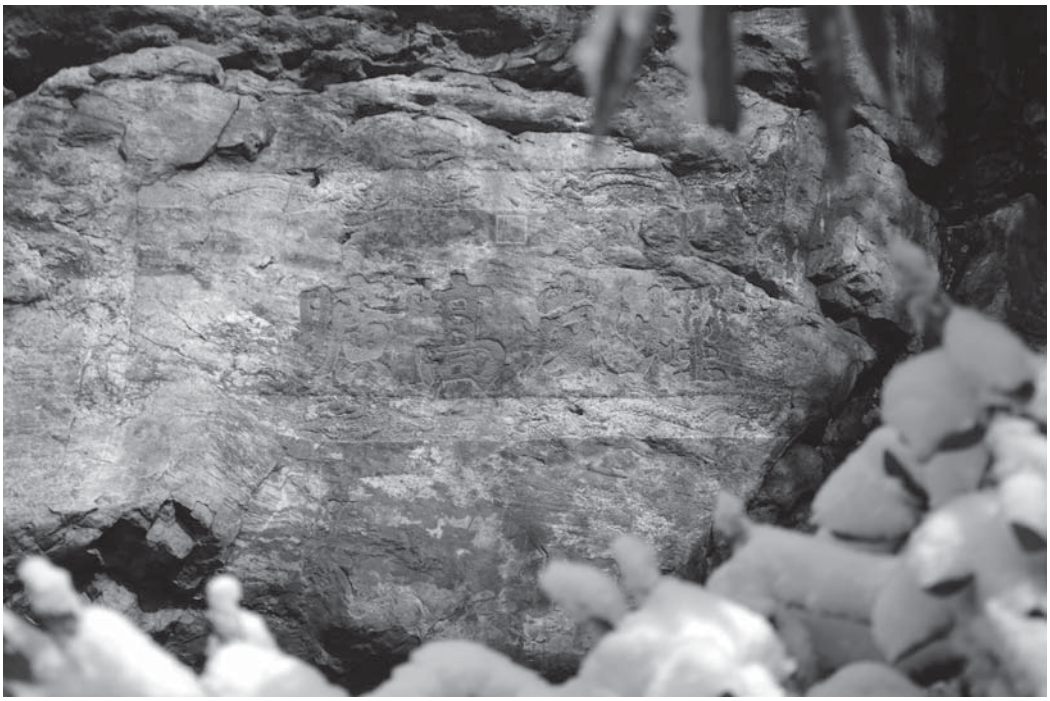




圖19 江蘇常熟虞山劍門風景區「煙嵐高曠」石刻及拓本 張軍攝影、李政提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0 清初 康熙帝便裝寫字像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國立故宮博物院，《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中法文化與藝術的交會特展》，圖版1B-1。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圖21 萬世師表御書「表」字 《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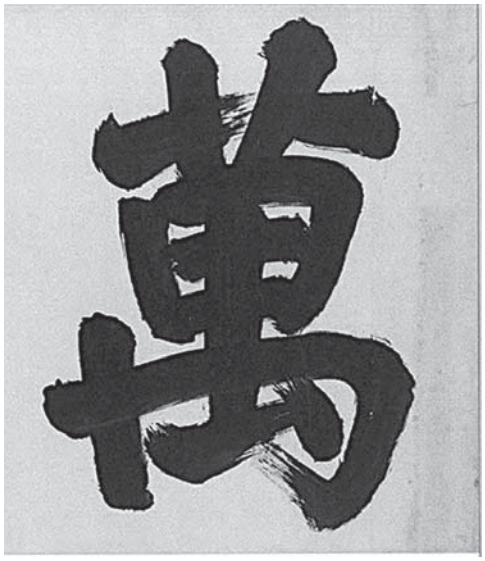


圖22 萬世師表御書「萬」字 《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左 中 右

圖23 萬世師表御書「表」（左）與顏真卿〈多寶塔碑〉「表」字（中、右）比較 《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顏真卿，《多寶塔碑》，東京：二玄社，19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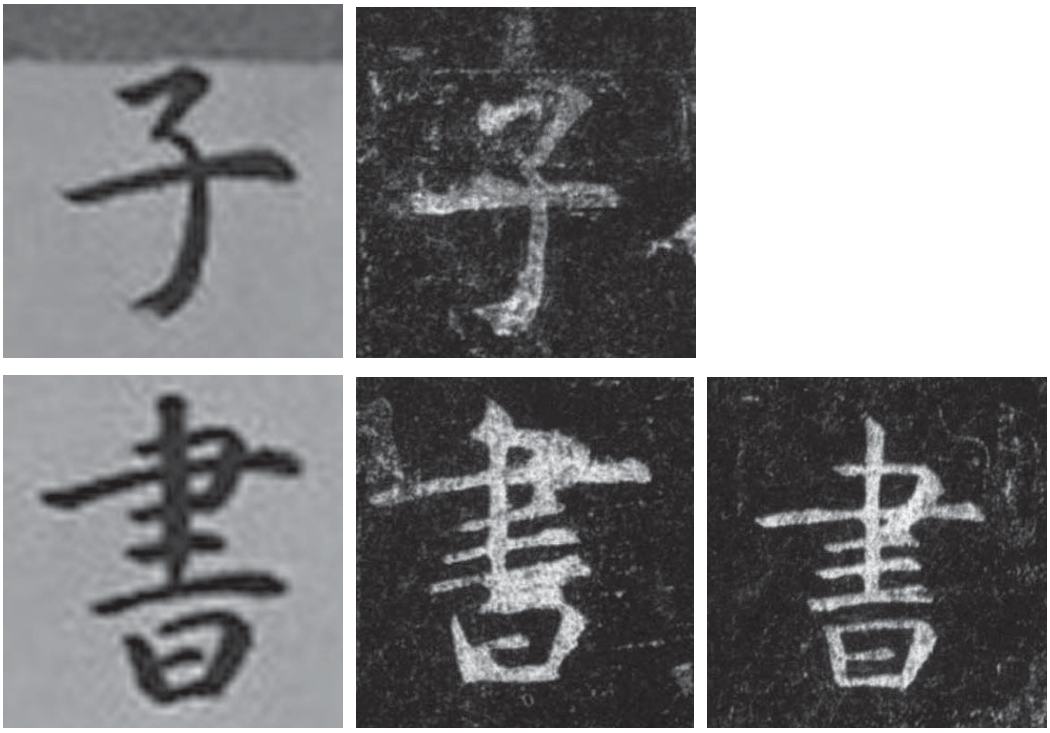
左　　中　　右

圖24　萬世師表御書「世」（左）與歐陽詢〈皇甫誕碑〉「世」字（中、右）比較　《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自歐陽詢，《皇甫誕碑》，東京：二玄社，1974。



圖25　康熙甲子孟冬敬書　作者自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左　　中　　右

圖26　萬世師表御書「子」、「書」（左）與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子」、「書」字（中、右）比較　《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東京：二玄社，1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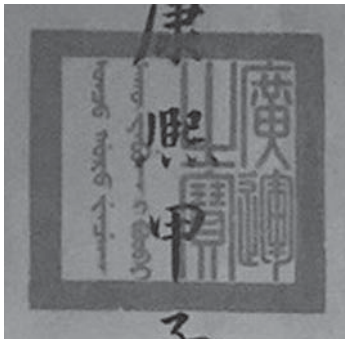


圖27　廣運之寶璽印　作者自攝



圖28　乾隆廣運之寶璽　鄭珉中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璽印》，頁2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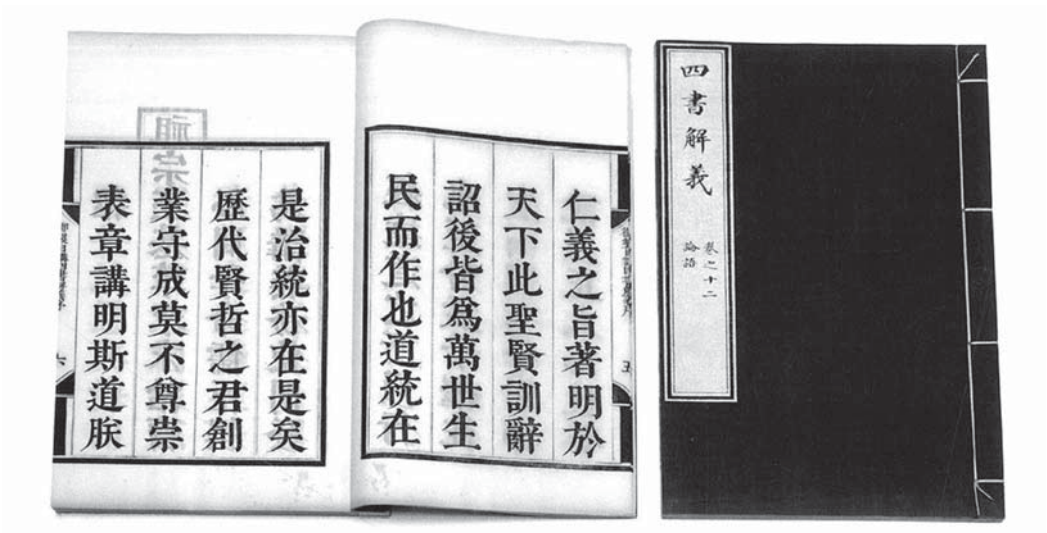


圖29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 清康熙16年內府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陳芳妹，〈萬世師表 御書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故宮文物月刊》，第412期（2017），圖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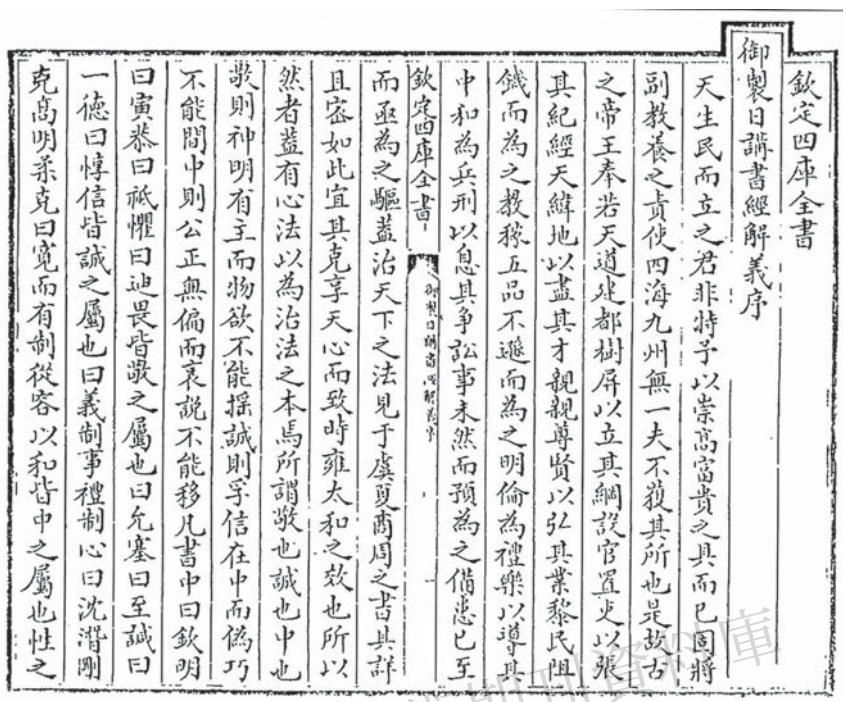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序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貴之其而已固將
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州無一夫不獲其所也是故古
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樹屏以立其綱設官置吏以張
其紀經天緯地以盡其才親親尊賢以弘其業黎民阻
饑而為之教稼五品不遜而為之明倫為禮樂以導其
中和為兵刑以息其爭訟事未然而預為之備患已至
而亟為之驅蓋治天下之法見于虞夏商周之書其詳
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所以
然者蓋有心法以為治法之本焉所謂敬也誠也中也
敬則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搖誠則孚信在中而偽巧
不能間中則公正無偏而衷說不能移凡書中曰欽明
曰寅恭曰祇懼曰迪畏皆敬之屬也曰允塞曰至誠曰
一德曰惇信皆誠之屬也曰義制事禮制心曰沈潛剛
克高明柔克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皆中之屬也性之

圖30 《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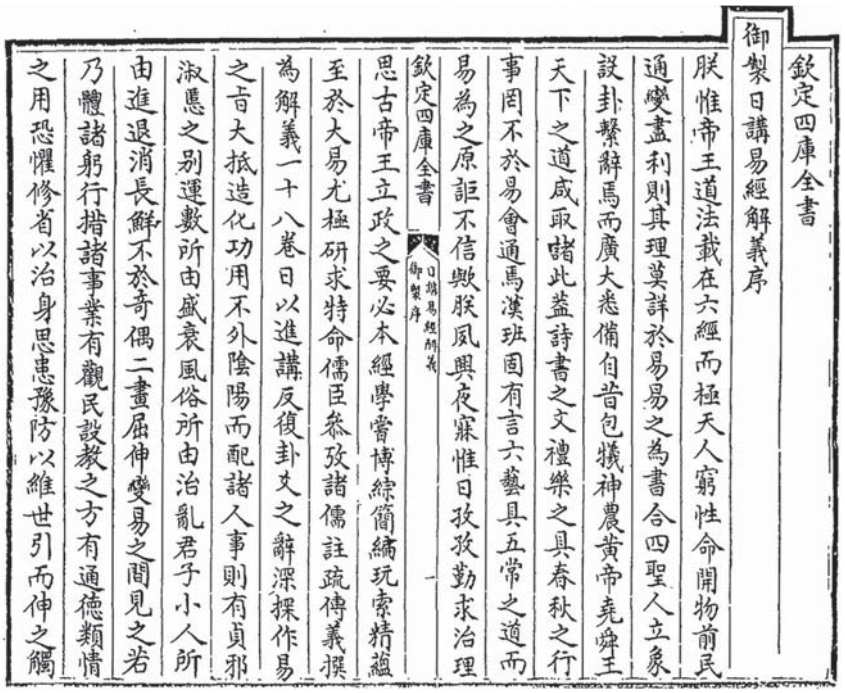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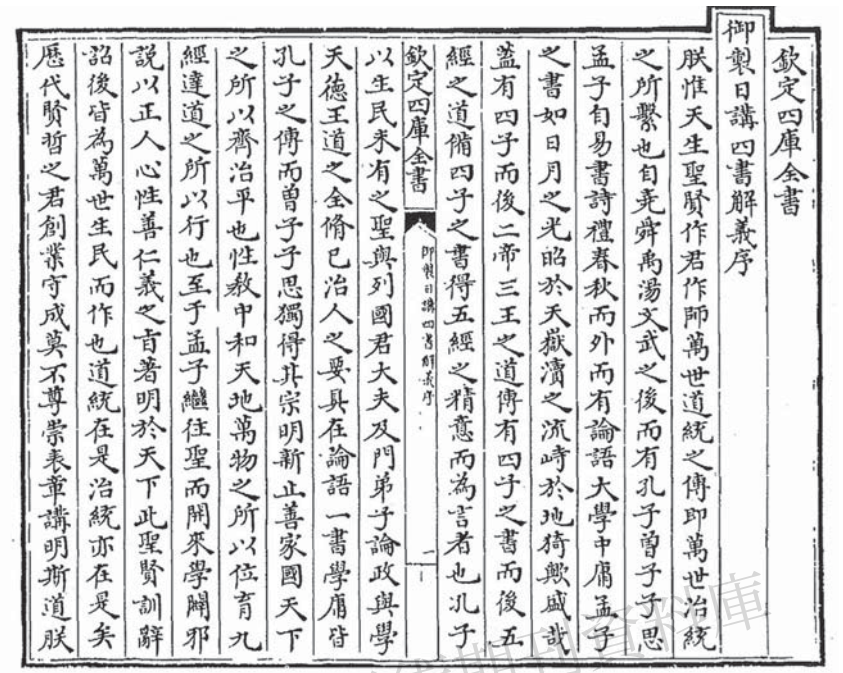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日講易經解義序
朕惟帝王道法載在六經而極天人窮性命開物前民通變盡利則其理莫詳於易易之為書合四聖人立象設卦繫辭焉而廣大悉備自昔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蓋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會通焉漢班固有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易為之原詎不信歟朕夙興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序 一
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經學嘗博綜簡編玩索精蘊至於大易尤極研求特命儒臣參攷諸儒註疏傳義撰為解義一十八卷日以進講反復卦爻之辭深探作易之旨大抵造化功用不外陰陽而配諸人事則有貞邪淑慝之別運數所由盛衰風俗所由治亂君子小人所由進退消長鮮不於奇偶二畫屈伸變易之間見之若乃體諸躬行措諸事業有觀民設教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恐懼修省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維世引而伸之觸

圖31 《御製日講易經解義》 〈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冊。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嶽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 一
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脩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于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

臺灣大學圖書館

圖32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8冊。



圖33 康熙八年（1669）御旨匾額 北京國子監 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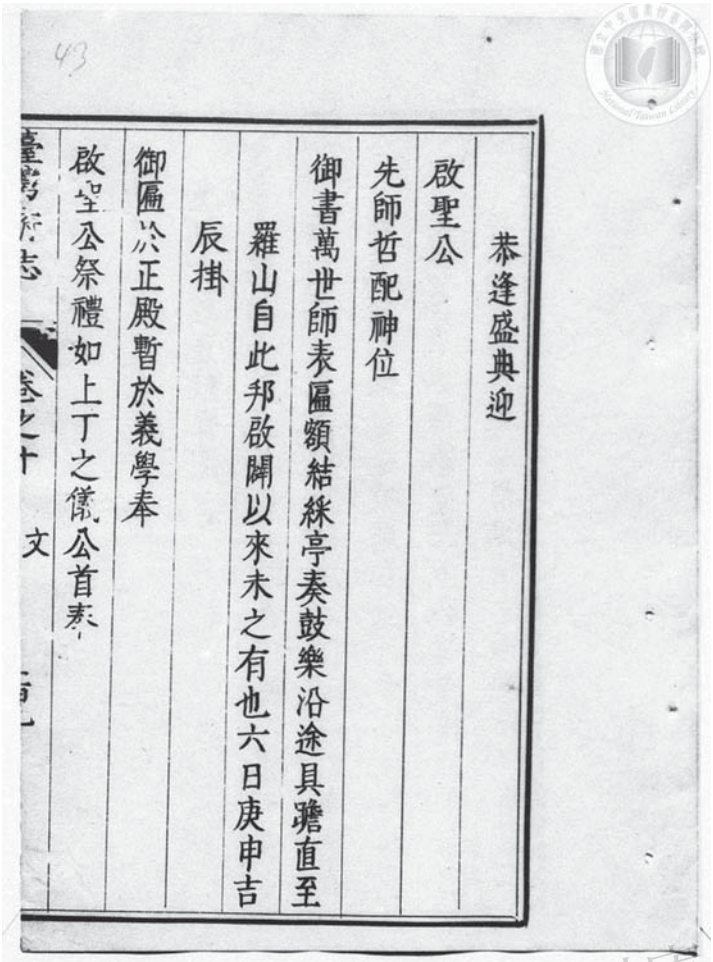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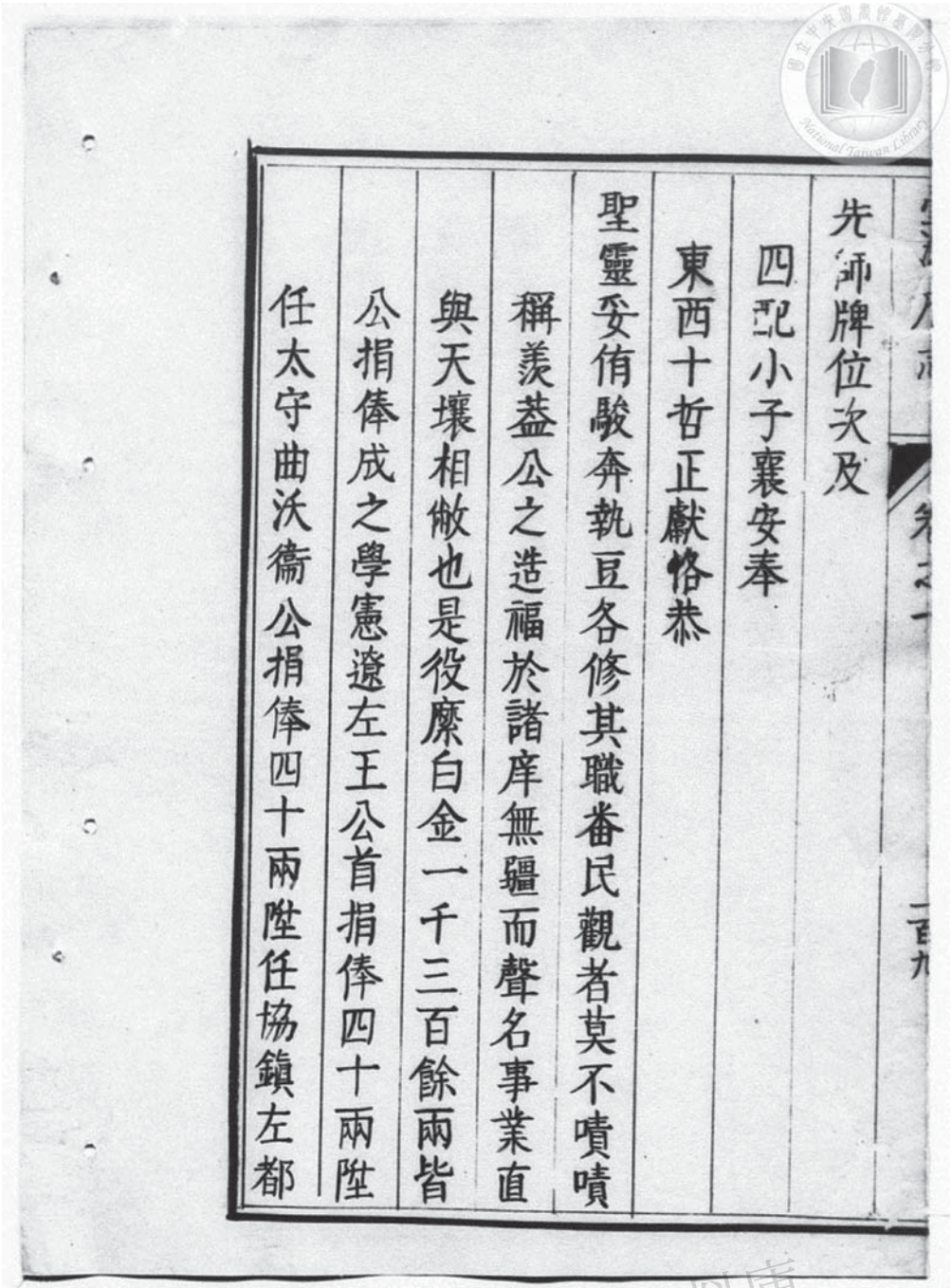


圖34 「御書『萬世師表』御匾，結綵亭、奏鼓樂，沿途具瞻，直至羅山」 孫襄，〈諸羅學文廟記〉，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10。檢索自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先師牌位次及
四配小子襄安奉
東西十哲正獻恪恭
聖靈妥侑駿奔執豆各修其職番民觀者莫不嘖嘖
稱羨蓋公之造福於諸庠無疆而聲名事業直
與天壤相敝也是役廉白金一千三百餘兩皆
公捐俸成之學憲遼左王公首捐俸四十兩陞
任太守曲沃衞公捐俸四十兩陞任協鎮左都

圖35 「番民觀者莫不嘖嘖稱羨」 孫襄，〈諸羅學文廟記〉，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10。檢索自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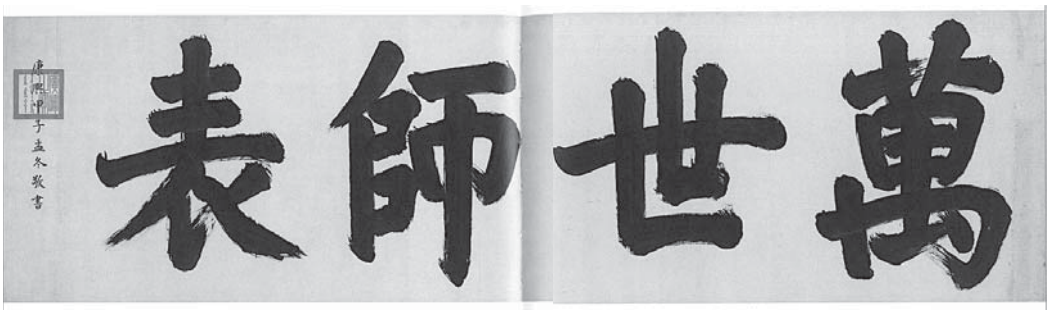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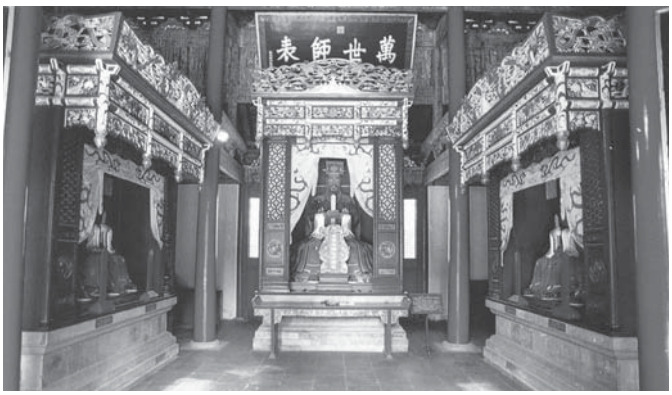
圖36　廣東德慶學宮「萬世師表」匾與萬世師表御書比較　陳傳平，《世界孔廟》，頁1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7　山西平遙文廟「萬世師表」匾與萬世師表御書比較　陳傳平，《世界孔廟》，頁2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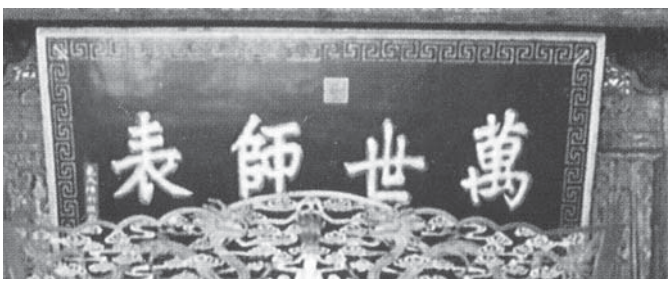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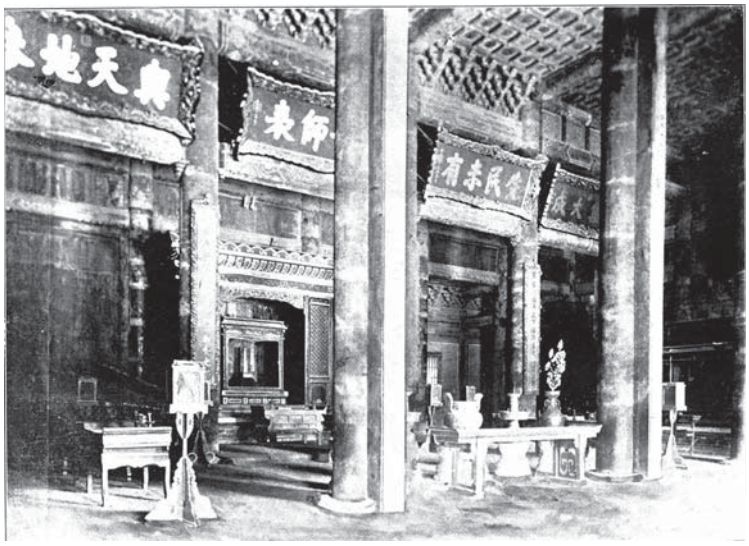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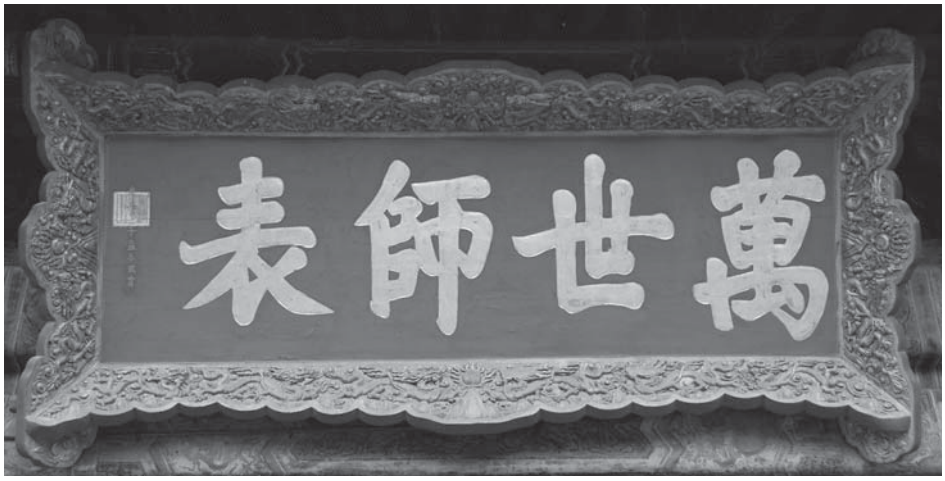




圖38　江蘇江陰文廟「萬世師表」匾與萬世師表御書比較　陳傳平，《世界孔廟》，頁1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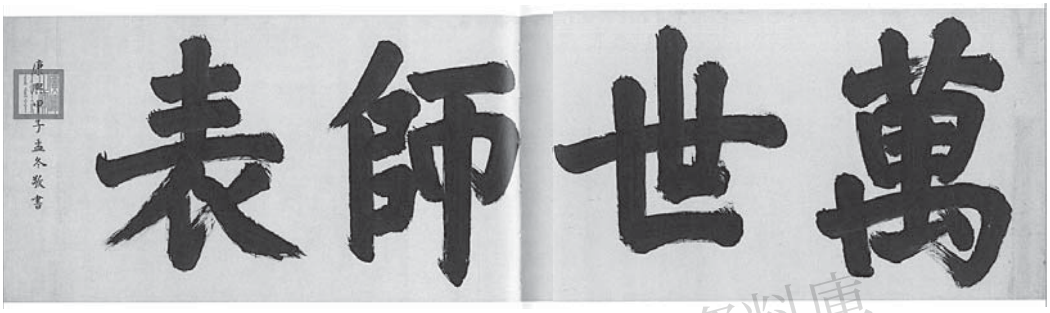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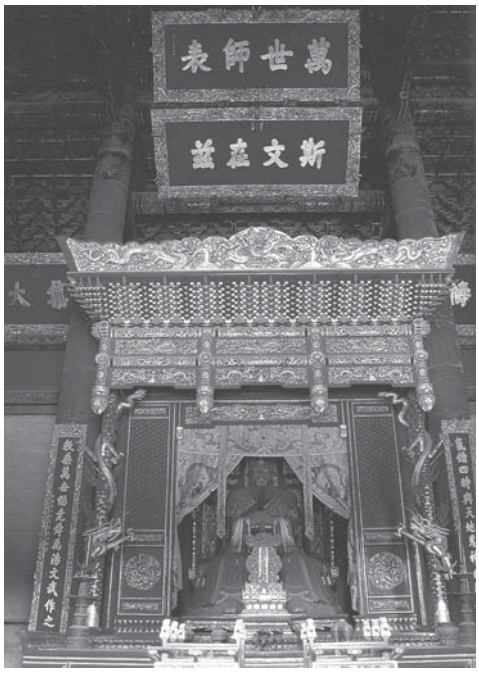


圖39　北京國子監「萬世師表」匾　與萬世師表御書比較　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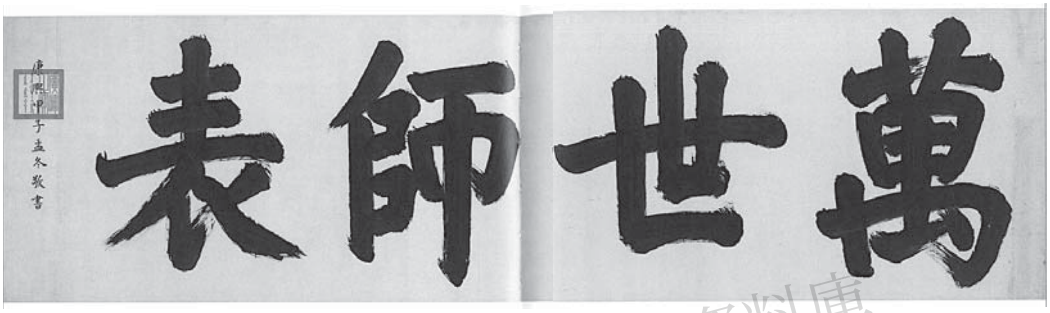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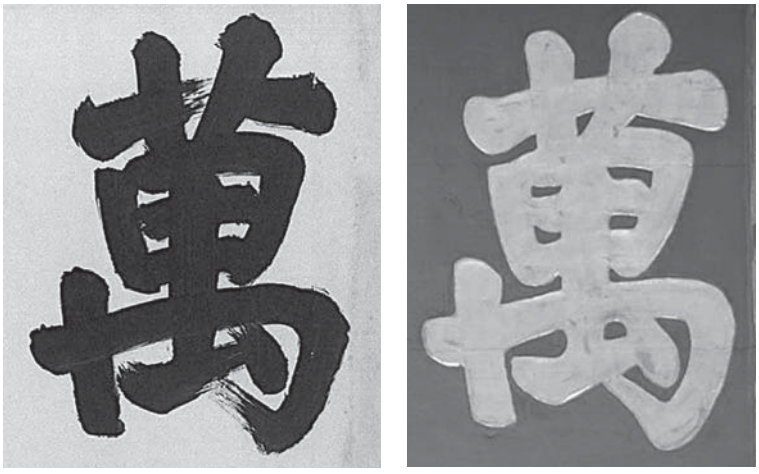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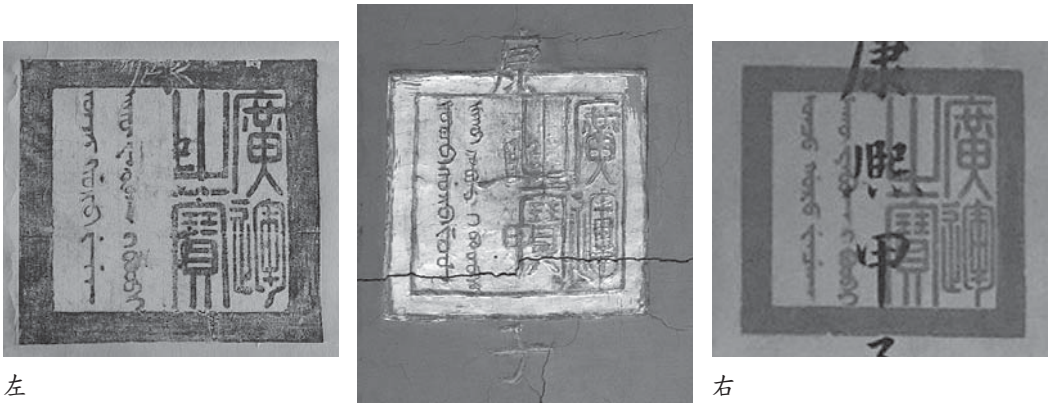
圖40-1 曲阜孔廟「萬世師表」匾與萬世師表御書比較 孔祥林主編，《孔子故里：東方智慧的文化殿堂》，頁75；吳誦芬主編，《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左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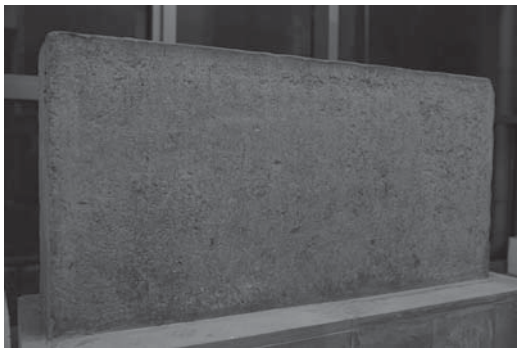
圖41　萬世師表御書（左）、北京國子監萬世師表匾「萬」字（右）
《萬世師表—書畫中的孔子》，圖版31；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左　　中　　右

圖42　臺南孔廟廣運之寶御書璽拓本（左）、北京國子監御匾璽（中）、萬世師表御書璽（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滿文



漢文

圖43　北京國子監順治九年（1652）六諭滿漢臥碑　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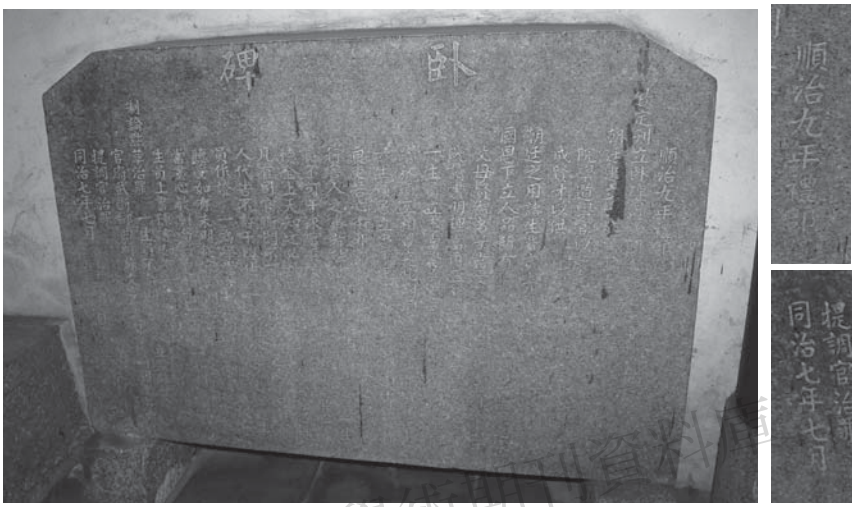


圖45　臺南孔廟六諭臥碑　同治七年（1868）立　作者自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4 北京國子監康熙訓飭士子文碑 康熙四十一年（1702） 北京國子監王琳琳主任提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Exemplar Teacher for a Myriad Generations" from the Imperial Brush

Chen, Fang-mei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o complete the arguments in the author's former papers in 2013 and 2017, this work explores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meanings of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Kangxi Emperor's original calligraphy of the "Exemplar Teacher for a Myriad Generations" in Taiwan. This study has three purposes: first, to clarify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sual images from the imperial brush to the imperial plaque; second, to trace the style of calligraphy; and third, to reconsider the cultural context and political intention of the writer, the Kangxi Emperor, who were tangled in ethnic contradiction and shifted from Manchu education to Confucianism. The original usage context of the imperial brush was accompanied by an unprecedented high-standard ritual ceremony for Confucius. With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original calligraphy, on the one hand, we can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ilitary conquest (戎)" of Taiwan and the "ritual activities (祀)"in the first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 and "Eastern Inspection Tour."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discuss the symbo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imperial plaque copies by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imperial brush. This discussion, in turn, also sheds new light on the continuance of imperial plaques at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Tainan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Kangxi Emperor.

Keywords: imperial brush, imperial plaque, "Exemplar Teacher for a Myriad Generations", jingyan 經筵, rijiang 日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